



在吉庆街，黄梅戏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婉转凄美的曲调，如泣如诉，往往当客人沉浸在杯觥交错时，演奏者已经进入曲中角色，心神黯然。

吴晓红，安徽人，自幼家境贫寒，会拉二胡的她，经人介绍早早来到吉庆街谋生计。吴晓红擅长演奏《孟姜女哭长城》《小辞店》等黄梅戏名曲。之所以能够把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缘于她对生活的感悟，缘于她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了曲子之中。这些作品有的是反映人间辛酸的思绪情感，有的则是表现对生活的美好期望。图为2011年9月，吴晓红在为客人表演。

尽管人生路上经历过太多的挫折、太多的磨难，如今借助吉庆街这个平台，吴晓红在武汉找到了归宿，过上了安稳幸福的生活。

(图/文 周国献)

目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谭仁杰 彭富春
陈避馨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光 朱向梅
杨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鹏 甘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邹仕芳 张霞 陆建军
陈立新 姚四平 曾艳红 窦梅
潘红莲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周敏

本期责任编辑：游迎

编辑：华蕾 张川蕾

封面设计：王鹏

城市之根



- 4 盘龙城遗址陈列诞生记 / 王颖
- 8 盘龙城杨家湾岗地的考古探寻 / 李喜兰

扶贫路上



- 12 老骥老区地为纸 扶智扶志情作笔 / 张安华
- 17 丹心育桃李 碧血扶栋梁 / 殷国俊

精工匠心



- 20 我的路 / 龚九宏

山有赏门



- 26 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历程及其启示 / 周国林
- 31 我曾为民族文学鼓与呼 / 何联华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0年第10期(总第336期)

委员天地

<<<< <

36 爱是不计回报的坚持 / 范红华

39 我在抗疫一线 / 董凌莉

往事漫忆

<<<< <

42 我为毛主席开船 / 胡建平(口述) 王荣海(整理)

45 用镜头记录抗疫天使 / 徐震山

人物春秋

<<<< <

48 弦歌一堂坐春风 / 王立

都市史话

<<<< <

54 近代汉口摊贩群体与都市生活 / 任晓飞

楚风汉韵

<<<< <

60 汉剧三生大王二三事 / 周希正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28日

定 价：8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sl@163.com

盘龙城遗址陈列诞生记

◇ 王 颖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是武汉城市之根，商代南土中心城邑，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源。为了再现此处遗址的前世今生，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文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正所谓数年磨一剑，今朝见锋芒。2020年5月18日，《江汉泱泱 商邑煌煌——盘龙城遗址陈列》荣获第十七届（2019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殊荣。该奖项是我国博物馆展览陈列的最高荣誉。我很荣幸亲历了整个展览的筹备过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中的点滴。

展览文本在打磨中完善

面对传统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展陈千篇一律的叙事结构，盘龙城文博人在不断地思

考、求解。记不清从何时开始，盘龙城遗址的陈列大纲在盘龙城文博人的脑海中逐渐酝酿起来。我只记得数年前撰写的几版大纲经过多次专家研讨后都不尽如人意，似乎都不能很好地对盘龙城遗址的价值与内涵进行充分解读。

为此，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万琳院长专门邀请到了以李伯谦先生（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为首的专家顾问团队，来自国内外各高校和考古科研院所的专家们结合自身的研究思考，纷纷为盘龙城遗址陈列大纲的撰写献言献策。特别是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教授都对盘龙城遗址陈列大纲提出了颇有借鉴意义的构思。经过多次的研讨论证，我们最终明确了盘龙城遗址的特色与地位，即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

源、商代南土中心城邑、武汉城市之根。这对整个展览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整个展览即紧紧围绕这三点进行诠释。

经过 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伏案工作，盘龙城文博人终于用他们的努力将最初 29 页的陈列框架充实为一部 495 页的陈列方案。刘森淼副院长主笔写下了陈列

大纲中的一段段要点，每个部分的标题以及前言、后记。我们年轻的策展团队在此基础上搜集相关资料，每个人立足于各自的专业所长与岗位特色，分别负责不同的展项。有的负责展览中文物的选择，从而对盘龙城库房内上千件文物烂熟于心；有的负责展览中多媒体展项的脚本撰写，为此练成了半个多媒体技术专家；有的则负责艺术品展项的管理，对装置艺术如数家珍。经过大家齐心协力、夜以继日的工作，陈列方案不断被充实，日臻完善，可以说是每一页都倾注着盘龙城文博人的心血。

展览内涵在研究中升华

陈列方案全面回顾了过去 60 余年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认知，深入吸收了近些年来最新考古科研成果。

自 2015 年以来，武汉大学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对小嘴遗址展开了联合考古发掘，相继揭露出灰沟、房屋等可能与铸铜生产相关的遗迹，并发现陶范、坩埚、青铜颗粒、



盘龙城遗址陈列中的宫殿模型

砺石、木炭块等铸铜遗物，初步判定小嘴遗址为盘龙城聚落内的一处青铜器生产区域。这为有关盘龙城遗址青铜器生产部分的陈列展示提供了切实可信的例证。

2018 年年初，在深化陈列方案的过程中，考古同仁无意间发现了盘龙城年代最晚的商代贵族墓葬——王家嘴 4 号墓。这一最新的考古资料当即被我们融入到了方案之中。出土的铜鬲置于展柜之中，我们利用这件研究盘龙城遗址废弃年代的代表性器物来直观回答观众关于盘龙城遗址年代下限的问题。

为了使陈列布展思路更加清晰，给公众传递更为科学严谨的展览内容，我们又对盘龙城遗址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其中的遗迹、遗物进行了深度解读。

宫殿建筑模型是本次展览中的一大亮点。第二展厅中的宫殿复原模型采用考古解读的形式，将建筑结构、材质、工艺、复原等环节信息集中呈现于模型之中。考古学家们结合古建筑相关研究，不仅完整呈现了考

古成果，满足观众对于“盘龙城的宫殿到底长什么样”的好奇心；同时，通过增加宫殿的建筑过程视频和说明板等形式提出有关宫殿建筑的有趣猜想，让观众在虚实结合的建筑模型中探索、思考，对于商代建筑能有更深入的感悟。

绿松石镶金饰件的复原是科技考古魅力的一次精彩展示。经过多学科专家的复原研究，特别是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教授的科研攻关，盘龙城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金饰件被复原为独体一首双身龙形器。我们有意识地将原件与复原件对比展出，并利用文字、图片、互动装置相配合的形式讲述绿松石镶金饰件科学复原和研究的全过程。让观众在了解绿松石镶金饰件这一商代先民精神信仰的重要物证的同时，感受到实验室考古的独特魅力。

如何讲述专业考古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然而，如何化解公众对考古“晦涩难懂”的传统认知，讲述好盘龙城遗址的前世今生，却是我们在展览筹备中面临的重大难题。

也许是太想将盘龙城的故事说给“你”听，我们的陈列方案里有很多难以理解的考古名词，这也成为了我们同设计师们交流之初的一道屏障。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策展团队探索出了团队值班制度。盘龙城文博人全程与设计师同室办公、深化方案，随时随地为他们消除大纲解读中存在的疑惑。设计师们在我们的“培训”下理解了“二层台”“腰坑”“碎器葬”等专业名词，俨然成为了具备一定理论素养的“考古工作者”。

盘龙城文博人更是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把年轻人创新的思维投入到设计方案的深化之中，通过换位思考，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表达的概念，通过设计转化为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的艺术装置与场景氛围。

整个展陈十分注重氛围营造，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第二展厅四周墙面满饰“夯筑城墙”，观众在大型宫殿模型处进行VR体验后，可小憩于身后的落地玻璃景观窗旁；面朝遗址背靠宫殿，闭眼千年，梦回盘龙城。第三展厅运用概念性山体造型，延绵起伏的展览流线，让观众仿佛看到3500年前盘龙城与中原之间的山水相连、文化相融。

如何满足不同观众需求

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展陈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普通公众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为此，我们在策展伊始就试图用心读懂不同观众的需求，注重兼顾不同的人群，力图把专业的考古知识生动趣味、多角度地呈现给观众。

蓝蔚先生骑着自行车探寻盘龙城遗址的场景，沿路经过的璇宫饭店、中心百货、岱家山公路桥都能勾起本地观众点滴的记忆；武汉物质文化遗产部分的讲述，则会打破外地观众关于武汉“三国夏口城”“民国大汉口”的旧有刻板印象，系统了解到武汉从古至今的历史文化变迁过程。

我们将遗址发掘整理余下的陶片置于特定亚克力保护罩内，观众可亲手感知陶片的纹理，触摸来自3500年前的文物；对于部分代表性的陶器、青铜器，则尝试运用3D打印技术进行“裸展”，让观众跟文物“零距离”交流、对话。除此之外，还利用展厅

内不同形态的物理滚筒，让观众去探寻、认识盘龙城先民生活中形态各异的食器、酒器，了解古今饮食炊具的传承，在趣味的拼接互动中增长知识。

根据展览涉及的盘龙城考古研究史、陶器生产、生活习俗等内容，我们研发了多门体验课程，并组织了多样的亲子益智和节日特别活动。

通过从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大圆鼎、青铜钺、青铜面具、大玉戈等重点文物中提取相关元素，进行深度艺术创作，形成日常生活、文具、礼品类等特色文化创意产品，实现了观众将博物馆带回家、将文化带回家的愿望。

引领一代人 影响一群人

在筹备展览的5年时间里，我们对陈列方案不断完善、升华，讲述盘龙城的故事，聆听观众的需求。盘龙城文博人从无到有、精耕细作，以专业的知识、饱满的状态，克服了展览筹备过程中的重重挑战，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历练与成长。此刻，他们或许正在策划即将引进的临展，揭开某个文明的神秘面纱；或许正在库房内观察某一件红陶杯，破译盘龙城先民留存的密码；或许正在互动体验区内授课，解读盘龙城先民的生产生活……

未来，更加强大的他们将继续在这片遗址上发掘、研究，同到访的观众交流、述说盘龙城遗址的前世今生。



2019年10月，观众参观盘龙城遗址陈列

伴随着盘龙城遗址陈列的完成，一座同遗址环境和谐共生的博物馆正式落成。遗址内的野生动植物、湖泊等自然资源与商代城址展示相得益彰，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了繁华城区中的一片绿洲。观众在展览中穿梭，逐渐清晰地拼构完成对整个盘龙城遗址历史的想象与认知，一点点拼接串联碎片化的信息，发现、见证。

盘龙城是武汉城市精神和文化形象之本，3500年武汉精魂，将深深印刻在每一位观者的心中。

（王颖：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考古研究部副主任、馆员）

盘龙城杨家湾岗地的考古探寻

◇ 李喜兰

2020年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联合考古队在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岗地连续工作的第6个年头。铁打的考古基地，流水的考古人员。不光是新来的考古队员，也有一些参观的爱好者、游览者看到杨家湾岗地的考古现场后，心中往往会有疑问：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区域持续进行多年发掘？在这里挖到了什么？具体是怎么挖的？

我连续3年亲身参与杨家湾岗地的考古发掘和勘探，了解整个工作的过程，本文将为大家揭示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岗地考古探寻的来龙去脉。

（一）

公元前16世纪，一座商代城市在现在的武汉市北部拔地而起，后人将其称为盘

龙城。作为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3500多年前它的样子受到考古学家以及社会大众的关注。1974年，北京大学联合湖北省博物馆首先开始了在盘龙城宫城区域的考古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为大家呈现了这座商代古城的初步面貌。走进现在的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仍可看见高出地面四五米的古城墙。城墙外则分布有一圈城壕，再往外围是贵族墓地、居民生活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城市功能区。而当时作为商朝王都的郑州商城，其形态则是内外两重城墙，普通居民生活区、手工业区等区域性区域则被外城墙包围。基于盘龙城在文化面貌方面与郑州商城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其城市布局是否也如郑州商城一样，存在外城墙？这成为考古人员探索盘龙城城市布局问题的一个新思路。

2001年开始，武汉市考古所、盘龙城博物馆（筹）、黄陂区文管所组成的联合考

古队对盘龙城遗址进行了大范围的文物保存现状摸底勘探工作。勘探工作取得重要发现，结果显示盘龙城遗址边缘区域有几条连续的带状黄土堆积，厚度在0.3~2米之间，这一发现使得当时的考古人员颇为惊喜。现任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副院长的刘森森先生是当时的考古组织者，面对这一发现，他立刻意识到可能是盘龙城遗址的外城墙，至于究竟是不是外城墙还需要进一步做大量的考古工作去验证。不过，刘森森先生的这一发现很及时，为当时保护盘龙城遗址立了大功！2006年编制的《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采纳了发现疑似外城墙遗迹的相关考古成果，使盘龙城遗址保护区的面积从1.1平方公里一下子增加到了3.95平方公里，面积扩大了将近四倍。

（二）

时间一晃到了2015年，盘龙城考古队也在这些年的变化中经历更迭，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为了解这一古代城市的生命史，毅然拿起手中的接力棒。以刘森森先生当年主持勘探的疑似外城墙为出发点，新的考古队对所属区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勘探工作，确认了可能在外城墙区域的具体范围。

如何进行发掘？是大面积整体发掘，还是小范围、多地点局部解剖，是考古队又一次面临的问题。现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考



杨家湾考古探方正射影像图

古研究部的廖航馆员，是当时考古队执行领队。经过考古队的多方讨论，最终选择小范围、多地点局部解剖的方法进行工作，如果确定为外城墙再进行大面积解剖工作。2016年，经过更细致的勘探工作，考古队选定了新的发掘区域进行解剖。通过解剖发掘，原来提到的条状黄土堆积确实被发现，而且在这处堆积一侧发现条状的石头堆积带，可能是外城墙的护坡。这一考古现象一度令众人喜悦不已。但是，随着发掘范围的扩大，这类堆积突然变窄，排除了被破坏的原因后，考古队员也只能承认，盘龙城原来被提到的外城墙并不存在。考古队员并未看到希望的外城墙，却在这次发掘工作中遇到了之后纠缠多年的另一个问题——这些有规律的条带状石头不是护坡又是什么？

我们将盘龙城的发展比作人的一生。人一生经历幼年、壮年、暮年，城市也经历

着兴起、繁荣、衰落的阶段。杨家湾这一区域正是城市衰落阶段的核心区域。按照常规逻辑，这一阶段的城市行动力出现不足，难以出现较大规模的人工活动。而出现的石头带遗迹，也应该在较小的范围内分布。在这个设想下，2017年，我们再一次布设了几个相距较远的解剖沟，均在解剖沟内发现石头带遗迹，并且在遗迹带中还包含着商代的陶片，就更加证实了这一行为发生的时间。大面积的人工遗迹、衰落的城市阶段，两个矛盾的条件组合成了考古队急需去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遗迹的探索，也将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盘龙城在最晚期的城市面貌。

考古发掘，勘探先行。为了确定石头带遗迹的范围，2018年，我们在杨家湾北坡进行了6万平方米的勘探。通过勘探，一个远超我们想象的范围内均分布有石头，而这些石头周围还发现有商代的陶片。同年，我们再次以长探沟的形式，对石头带与文化

地层之间的关系进行探寻。这一次，我们找到了考古发掘中最坚实的证据。一般情况下，考古发掘中会发现晚期的东西压着早期的东西，这样的相对关系是判断时间早晚最坚实的证据。这次我们发现属于商代活动留下的堆积压在了石头带之上，由此证实了石头带遗迹的年代属于商代。

探索石头堆积的形成方式、补充石头堆积的年代学证据、了解石头堆积与居住区之间的关系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2019年，我们在一处有文化地层和石头堆积的区域布置1000平方米进行大面积的揭露式发掘。这些石头堆积分布面积广但不是路面式的平铺，而是分布在包含有商代陶片的土壤中。整个发掘区少见与生活相关的遗迹，大面积土层中的石头堆积存在明显的人工搬运行为。领队张昌平先生说：“正如天安门广场确实不会有人挖坑填土。这些人类有意识进行的石头铺设，可能造就了杨家湾岗地北坡独特的大型建筑，成为这个城市在晚期重要的活动场所。”

(三)

除了田野发掘工作带来的挑战，在石头堆积的记录上我们也遇到了困难。从对石头堆积的年代和性质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开始，带队老师就反复强调我们要想办法把考古信息和现象认知展现出来。不同于一般田野发掘中面对的常见遗迹，比如房子、墓葬，此次发现的人工铺设没有明显功能性的石头堆积的确很少见。科学细致的考古记录工作，既可以增加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深



2019年9月，考古人员在考古勘探中使用全站仪测点定位

人思考，也有助于其他人在看到记录之后提出新颖的看法。

在石头堆积记录工作之初，我们明确了要对每一块石头的位置、形状、与周围的土层关系以及分布情况进行展现。之后，不断摸索尝试了不同的展现方法。刚开始，我们借助全站仪获取每块石头形状关键点的相对坐标，由此来进行石头的绘制。没想到在实际操作时发现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效率十分低下。每块石头最少需要4个点，最多可能需要6至8个点。每天花费3个劳动力，却只能完成20到30块石头的测量，而这已经形成了200个左右的计算点。目前，整个发掘区粗略估计有大小不等的石头成百上千个，显然之前的测绘方法无法短时间内完成数量如此庞大的石头堆积记录。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新的方法。通过与考古数字化公司的讨论，我们找准问题改进技术，在已有的绘图软件基础上，结合全站仪测量点，让绘图软件自动标记导入点，由计算机自动计算数据，节省了大量的计算时间。一般测量人员完成测量的同时，绘图人员也已经完成了对应的绘图，极大提高了绘图效率，短短一周就完成整个发掘区内的石头堆积数字化记录。

在石头堆积与文化地层关系的表现上，我们也经历了一番波折。对于一般的考古工地来说，借助无人机进行航拍，获取发掘区域的正投影照片，即可看清楚发掘区域内的各种遗迹之间的平面关系。为了保护 and 展示遗址的需要，杨家湾岗地的考古区域被大棚覆盖，大棚的高度限制了无人机的取景拍摄，直接获取整个发掘区域正投影的道路被阻断。

办法总比困难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因为整个发掘区是由一个个5米×5米的考

古探方组成的。我们计划利用三维建模来获取每个探方的正射影像图，再无缝拼接组成一张完整的发掘区正投影图像。但是，实际操作中又发现建模图片因精度、亮度、分辨率等多种问题，无法形成清晰可见的效果图，导致我们自己创建三维建模的打算失败了。但是，这一方法又是目前最好的呈现方式，于是寻求专业团队的帮助成为我们最后的选择。最终，我们借用三维扫描以及高精度的图片拍摄等方式，石头堆积的分布、形态，甚至营建、破坏过程都可以呈现，这就为之后展示、研究创建了基本条件。

6年漫长的考古工作，我们从最初了解盘龙城布局这一目的出发，将工作的重点从“外城墙”探寻逐步地转移到石头堆积的研究上，试图通过抽丝剥茧的揭露与分析了解石头堆积的性质以及功能，进而深入地去探讨石头堆积所代表的人类活动与杨家湾南坡发现的高等级建筑之间的关系。从考古勘探到布设探沟试掘，再到大面积发掘，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实现我们原初的工作目标。

这些年，杨家湾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是盘龙城考古工作的缩影，盘龙城考古人始终以学术问题为导向，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渐推动，一步步聚焦我们的研究重点，更借助多领域、多学科的方法来展现我们的认识，推进我们的发展。盘龙城考古工作仍将继续，这座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的互动定会经久不衰。

（李喜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研究生）

老骥老区地为纸 扶智扶志情作笔

◇ 张安华

2015年，武汉市农业科学院实施“三百行动计划”（即遴选全院100名农业专家，重点帮扶100个贫困村，带动发展100家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我有幸入选，驻点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毛家冲村履职脱贫攻坚工作。

5年来，根据省、市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关政策，我们优化了毛家冲村山水林田和市农科院人才、技术、资质等资源配置，引进、组建6家农业企业和1个专业合作社，沿村域轴线创建经济林生态种养高效模式展示园和4个家庭农场。产业扶贫战略催生了园林苗木、古法红糖、特色种植、精品养殖、农耕体验和民宿餐饮等6类产品和“一园四场”联通“6+1”企业布局的农旅“主轴经济”产业模式，使地处革命老区的省级重点贫困村实现了产业兴、村湾美、集体强、村民富的扶贫脱贫目标。

问诊穷根 稳行正言

1962年，我出生于蔡甸区一个普通农家，对农村并不陌生。驻村前我曾想，以我35年农业技术研究、成果推广和服务“三农”的工作经验，帮扶一个村脱贫应该问题不大。可2015年9月初到毛家冲村时，还是被当时的状况所震撼：全村535户1705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0户103人；村内没有产业，村集体负债11.8万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8000元；村域范围见不到青壮年劳力，常年留村的280余人中，空巢老人89人、留守儿童18人；全村1678亩耕地，撂荒率高达90%。举目荒地、荒山、荒坡、荒塘，夜无灯光、昼无路人，给这个地处新洲区凤凰镇西北边陲的贫困村更增了几分凄凉。

工作对接的第三天，我带足一个月的治疗“三高”药品和即食方便食品在村里住下了。在村干部期盼和怀疑的目光中，我遍访了全村13个自然湾，整理笔记1.6万字。

“我们晓得村里穷，村里人都不愿意在村里呆，我们也想做事，但不晓得么样搞。”与村“两委”座谈中的这段集中意见对我触动极大：精准扶贫首先要提升村“两委”的信心，找准贫困根源、分析资源优势、明晰发展方向，是精准扶贫的破局关键。

2015年10月，在市农科院党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武汉都市农业规划设计院工作专班入驻毛家冲村。我们一行5人22天吃住村委会，踏勘村域自然资源、跑遍区镇规划部门，入田间调查生产情况、进湾组了解民风民情，白天请老村民座谈、晚上找村干部会商。负责对接工作的村妇联主任谢金爱戏言：“每天陪着你们专家钻林子、入农户，晚上还要收集数据定明天的事情，我老公都威胁要与我离婚了。”10月底，《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毛家冲村全域发展规划》与村“两委”和村民代表见面了。《规划》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和直观生动的图表，剖析了毛家冲村贫困的根源：缺规划引领、缺资金支撑，缺产业引领、缺技术支撑，缺劳力引领、缺智力支撑；认为：该地区区位优势、地形地貌丰富、山水环境优美，具备原乡村、原田园、原生态、原文化的“梦里原乡·生态田园”产业基础；提出：对接凤凰镇高效循环农业示范区产业发展规划，依托各级扶贫项目和农科院人才、技术、资质资源，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延伸产地初加工业、开拓乡村体验和森林旅游业，统筹土地资源引进业主，促成农旅产业融合和能人回乡创业，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1942年出生的五

保户程首清说：“我在村子里生活了73年，守着2.4亩水田旱地维持生计，从来没有觉得村里有这么美，而且还可以建设得更好，真的还想再活20年。”

我学农、务农而深知农业苦、农村穷、农民难，驻村后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清空床位，因为只要忙完户外工作，与到寝室找我交流谈心的村民、村干部和业主聊至深夜转钟是常事。我们聊产业、聊技术、聊发展思路和管理理念，也有人善意关怀：你一个1985年入党的高级农艺师，天天在村里忙出忙进，搞得村干部家里有事都不好意思请假，你能不能休息几天让大家也喘口气。还有人不惑求解：你每周往返200多公里驻村扶贫，不谈路费，即使开车也要4个多小时，既不图家庭子女，也不求个人名利，哪来的激情和动力。我解释说，“老”不应是搞特殊的本钱，而应是带头垂范的压力；精准扶贫、消除绝对贫困是国策，是我们党对世界的庄重承诺，临近退休有幸参与其中，唯恐人言老不作为，哪敢虚度时日博取私利，能见证全村脱贫致富，比我写几篇论文更有意义。

精准扶贫相关政策规定，年满58周岁不宜驻村扶贫。2019年10月，在市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领导和毛家冲村“两委”的联名要求下，农科院党委决定我继续履职驻村工作。惭愧之余，我更加珍惜这一工作机会。

2020年年初，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封城，我下沉到洪山区建和社区。数着农时节气，我每天问询、商议毛家冲村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工作；利用轮值休息，两次进村了解疫情影响；积极组织防疫物资，并于3月23日入驻毛家冲村。32天里，白天协助卡点执勤、组织发放抗疫物资和贫困户、边缘户入户慰问；晚上策划编撰《次生林升



2020年5月，张安华（左）在田间指导村民进行疫后农业生产

级改造》和《经济林及林下作物新品种示范》项目任务书；根据疫情影响修改《武汉市农科院（2020）精准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组织机械、劳力平整荒坡75亩，建成精养鱼池28亩；移栽林果苗木6000株，定植瓜菜种苗5.6万株；种植甘蔗42亩，修剪园林景观苗2100株，与农时赛跑推进高效模式展示园和四个家庭农场高标准施工、有序复产，顺利完成“一园四场”季度目标任务。村党支部书记程纲全深有感触：“以张老师的学识水平、阅历资历和敬业精神，我不想撸起袖子往前冲都找不到借口。”

双帮双带 扶智扶志

有了《规划》，选准帮扶产业、制定实施方案就成了重中之重。借鉴规划专班工作的成功经验，我建议农科院党委在院系统跨学科组建“精准扶贫专家服务团”，强化学科协同、发挥技术优势、深耕产业扶贫。结合村域荒坡、荒田治理和农科院人才技术

优势，制定了《籽莲种植加工综合开发实施方案》和《园林色块苗产业化实施方案》并通过了专家服务团论证。

2016年春，我拿着《籽莲种植加工综合开发实施方案》和《园林色块苗产业化实施方案》找贫困户、找村民、找村干部，反复说明先行示范、扩大规模后形成特色种植业的可行性。在世代种植水稻、棉花、油菜，撂荒十几年的贫

瘠土地上能实现产值翻番？村民有的婉言谢绝，有的直言不搞。怎么办？我牙一咬，返租农民的地，主要农资扶（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帮扶），帮着农民做，帮助农民销。当年示范种植籽莲12亩，红叶石楠和金森女贞容器苗8亩；产品出来了，我会同服务团成员联系市场、商谈价格，帮助销售藕带、鲜莲子1200公斤，铁莲子750公斤，藕种2000株，红叶石楠、金森女贞容器苗4.6万株。后来算账，籽莲平均亩产值4360元，园林容器苗平均亩产值1.2万元。

如今，籽莲种植面积扩大至83亩，2个品种4个规格莲子初加工产品已进入供销社电商平台，初步形成籽莲种植产业；园林容器苗扩增至5个品种57亩，与果树、樱花圃共同打造的130亩园林苗木产业园已然成为村域又一新兴产业。

贫困户底子薄、不敢动、亏不起，种植企业缺技术、缺人才、利润低，我在想，“帮”可立自信而扶志，“学”才能授人以渔而扶智。我以推行的“全程立体式技术服

务+引导式农资精准帮扶”与“红色头雁”工程相结合，吸纳3名村干部和8个贫困户，围绕生态种养、水体综合利用组织实施扶智典型计划，带着能人学、带领能人干。

自2018年扶智典型计划实施以来，先后组织省内外交流考察3次，推荐参加各级技术培训班32人次，开设毛家冲村农民培训学校培训农户248人次，送检土样22个、水样11个，引进养殖、种植类新品种12个，推广高效模式3个，筹措配套农资40.8万元，在推动特色水产、畜禽和糖蔗等产业配套发展的同时，培养了一批致富种子，增加了农户务工收入和村集体经济积累。

程国兵是毛家冲村农民，2017年以前一直在外做生意，有不错的收入，在能人回乡政策感召下加入村“两委”。“回村以后，我就一直在谋划做点产业，扶智典型计划增添了我盘活闲置土地的信心，我乐意做这个破局头雁。”程国兵说。2018年年底，程国兵流转50余亩沉睡多年的荒泽地，推精养鱼池、请贫困农户参与、立分配机制，我推荐他拜水产专家李波为师，到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定向学习鲃鱼养殖技术，加入鲃鱼养殖微信群；筹措足量鱼苗和小鱼饲料，顺利启动了特色水产养殖项目。一年下来，他谈起鲃鱼养殖俨然一副行家派头。到了收网季，10个月精养，从每斤50尾的鱼苗增至平均每尾1.2斤，着实让村民连呼不可思议。区领导调研后说：“帮富一个、带富一群，这个典型树得好。”

2017年，点溪园古法红糖基地入驻毛家冲村，“亮新欣”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程喜林与其合作，将甘蔗种植、红糖古法加工和产品市场开发形成毛家冲村糖蔗产业的良好愿望。合作社当年试种甘蔗15亩，甘蔗单产、品质、出糖率和产值均

不理想。2018年，我将其纳入扶智典型计划，带着他查资料、分析甘蔗生长特性；测土壤、调整栽培地块；跑市场、了解专用品种，3次修改《甘蔗高效栽培技术方案》。通过引种“糖蔗3号”和“雪菲(211)”白菜苔新品种，配套土壤生态修复剂、短肽全元素水溶肥和蛋白螯合叶面肥等新产品，示范推广“糖蔗——白菜苔”高效模式栽培80亩。2019年，白菜苔采摘25.92吨，尾菜还田60.8吨；甘蔗亩均产量6.2吨、亩均增产11.2%，提高出糖率8.5%，增值15.32%；全年提供常态就业岗位43个，人均务工收入6317元；村集体分红10.2万元。村民增收、集体创收、业主提质增效，有力助推了糖蔗产业健康发展。

倾力长效 倾情谋远

发展、壮大村域企业是实现村集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产业扶贫带动村民致富的重要举措。至2017年年末，毛家冲村依托前期扶贫成果，先后引进旭华源精品苗木和点溪园、仙人洞、乐田、凤鸣、民悦生态农业6家公司，共流转土地2500亩，总计注册资金3860万元，与“亮新欣”种植专业合作社组成了村域“6+1”企业布局。但是2018年总产值仅550万元、库存加工产品价值300余万元，人口资源负效、自然资源减效、设施资源低效，企业经营困难，村集体土地租金也得不到保障，业主去留矛盾。

历时三周，我组织调研专班针对企业运营和业态布局，从基本情况、经营状况和企业愿景、需求与建议四个维度，先后两轮入“6+1”企业调研，汇集55类信息、完成一企一册建档，撰写了《毛家冲村村域企

业现状调查报告》。客观指出毛家冲村产业定位与产业模式过度依赖一产，三产动力不足；业主抢占资源、等待机遇的观念严重；村集体在产业链质量构建和社会资源交流平台搭建及融资引智、生产要素协调上的缺位，增加了村级经济盈利模式与利益链稳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结合《毛家冲村全域发展规划》和《毛家冲村农旅发展规划》，提交了《毛家冲村产业资源整合构想》。

村域企业都是独立法人，产品涉及苗木、茶叶、甘蔗和畜禽、水产品及红糖、有机肥、餐饮等加工、服务类产品，不仅普遍承认规模小、管理缺、壮大难、投资预期动力不足和抗风险能力差，而且由于经营范围、市场主体、投资与资源占用规模各不相同，没有统筹兼顾的高站位方案，资源整合难度极大。我先后5次组织召开村“两委”和域内业主资源整合专题会议，商讨“资源变资本、园区变景区，三产主导、协同发展”的可行性。从政策机遇、市场需求分析到产业模式和资源配置，从农旅资源管理型运营主体、协商决策机制构建到管理架构和利润分配方案，我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公正表述损益得失，多场合主张《毛家冲村产业发展机遇与思考》。各业主以现有资产估值为资本、业主间互为依托和有偿服务对象的“两极、四区”农旅资源优化整合方案引起村“两委”和村域业主强烈共鸣。“毛家冲产业联合体”签约仪式上，业主们纷纷向我道贺：“是你的真诚和付出，说服了我们求同存异、抱团发展。”

沿村域轴线创建“一园四场”是联通“两极、四区”观光环线的纽带性项目，我专题汇报，争取新洲区、凤凰镇和市农科院各级领导支持。凤凰镇组织策划并获批新洲区59万元精准扶贫资金用于120亩展示园

次生林升级改造，区农商行提供贷款支持顺利完成四个家庭农场注册，市农科院全额资助“一园四场”所需园林果树苗木、禽鱼瓜蔬种苗和配套农资及“毛家冲”商标注册、包装专利申请，授权展示园挂牌“武汉市农科院研学游毛冲农耕体验基地”、产品包装使用“武汉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支撑”标识。2019年9月，《毛家冲村农旅产业2020工作计划》和《毛家冲村研学游基地实施方案》启动，《长江日报》2019年12月16日以《整合全域资源 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为题专版报道了毛家冲村产业扶贫工作成效。

2016年，毛家冲村摘帽出列，贫困户脱贫销号。截至2019年年底，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9747元增长到17602元，增幅80.6%；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6年的16万元增长到33.85万元，实现翻番；全村产业布局合理、步入良性发展，3年累计为村民提供就近务工机会5万余人次，增加务工收入500余万元。“武汉市农科院研学游毛冲农耕体验基地”挂牌仪式上，村支书程纲全向与会领导汇报脱贫成果后，特意拉着我的手介绍说：“这是我们村产业发展的总设计师，是将论文写在脱贫攻坚大地上的农业专家。”

（张安华：武汉市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研究室主任，市农科院驻新洲区凤凰镇毛家冲村工作队队长）

丹心育桃李 碧血扶栋梁

◇ 殷国俊

“哟，是殷校长啊，快，快进屋来坐。”“殷校长，就在我屋里吃饭吧。”村民们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我在武汉市教育局扶贫办工作3年了，并非驻村队员，但，人不驻村心驻村，村民们早已把我当成了村里的一员。

扶贫先扶智，帮困先育人。2017年岁末，我从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借调到市教育局扶贫工作专班，从一名人民教师变成了一位扶贫工作者。教育口的扶贫工作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的给贫困学生捐点钱、给贫困地区的学校捐点设备那么简单，除了每日收发文件、写材料、整档案以外，其实更多的精力是花在局里上传下达，协调省市扶贫办、市直各部门、各区教育局、教育扶贫成员单位和驻村工作队上面，为全市教育扶贫工作做好服务确实比为一校师生做好服务要充实得多，其间的酸甜苦辣也只有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体会……

换角色，在担当中创造佳绩

原来当班主任带数学课，加班加点、苦干实干是我的工作常态，6名中考状元，

是我的工作业绩；而今接手扶贫工作，每天有提升、半月变专家是我的工作写照，参与制定历年武汉市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要点及配套支持计划，形成完整的教育脱贫攻坚政策体系，是我的工作动力。

前些年到处跑是给各区的同行作教材教法报告、培训骨干教师；现在为了加强市教育局与市直各部门、各区教育局、教育扶贫成员单位和驻村工作队的联系，我的足迹几乎遍及新城区各个街道，目的就是在及时全面掌握各区教育扶贫工作动态，统筹推进教育扶贫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不知不觉中，我还学会了一些蔡甸、江夏、黄陂、新洲的特色语言，真的能拉近咱与老乡的距离。

原来主编参编教辅书籍、撰写论文、研究课题；现在这3年来，经我手累计收发文件通知材料千余件、编印《文件汇编》《政策摘要》《武汉市扶贫政策知识手册》和《武汉市教育扶贫应知应会手册》等资料，撰写各类计划、方案、总结、汇报累计240余万字，开展理论学习、驻村帮扶、资金协调、数据共享、政策落实等业务会议及培训40余次，有效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落实。

以前媒体对我的报道多是省市岗位能手、课改专家、优秀教师和班主任；现在更多的是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具体的事，3年来各级媒体宣传报道我局扶贫信息22次，其中人民网、凤凰网、新浪网、大楚网、《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市政府政务要情、市教育电视台新闻均有，另上报市扶贫办工作简报85篇。

两相对比，才发现我目前的工作量其实更大了，范畴更大了，意义更大了，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也更大了。

精施策，在实干中争创一流

“这几年累得值！”这是我和教育扶贫战线同事的一致观点。

助学扶智，武汉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的资助政策逐年完善，做成了全国的典范。现在累计确定建档立卡助学扶智学生98182人次，涵盖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全学段，共落实专项资金8830万余元，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改薄升级，全市已改善413所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其中贫困街道义务教育学校106所，总体提升和改善了104所乡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全市22个贫困乡镇全部建设了公办中心幼儿园，改扩建53所村级幼儿园，优化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控辍保学，现已构建了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结合”控辍保学工作体系，认真落实“区政府——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学生家长”“区教育局——学校——班主任——学生”双线控辍保学责任制。截至2020年疫情暴发前，全市核查疑似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全部以劝返复学或送教上门予以解决。特殊关爱，全市累计建

设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站73个，2019年开展各种关爱活动1091次，参加活动的学生累计达44350人次。队伍建设，3年间，全市累计补充编制教师3300人，其中农村地区教师1335人；义务教育学校交流教师9594人；参加市级培训农村教师3万余人，占全市比例50%以上；在高级教师职称量化评审中对农村教师给予倾斜；将农村艰苦边远地区薄弱学校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提升5%。对口帮扶，自市教育局对口帮扶新洲区旧街街道莲花塘村以来，该村与湖北鼎新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村企联营合同，实现村集体年收益18万元；通过与万佳福茶叶公司签订合同，免费提供茶苗，白茶由公司回收，确保茶农收益稳定；引进养殖能手，新建小龙虾养殖基地30亩；开发山地，新建白茶园60亩并安装自动喷灌设施；重建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及现有旱厕，新建老年人活动中心、村卫生室和百姓大舞台，安装太阳能路灯91盏、垃圾箱34个，改建无公害三格化粪池130户，村容村貌及服务功能明显提升，全村贫困户提前销号摘帽。社会扶贫，建设“社会扶贫网”工作平台，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学生及教职员工开展爱心人士注册并进行贫困需求对接，大力推进“互联网+社会扶贫”新模式，精准对接帮扶责任人和贫困户实际需求，成功率达100%，教育系统成功注册爱心人士10余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也为我市脱贫攻坚工作和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舍小家，无悔投入扶贫

我家里生活着母亲、我和女儿祖孙三代共3人。2018年正是脱贫攻坚原计划收官的紧要关头，我的母亲因糖尿病引发酮中

毒，每天都要到中医院去输液、扎针灸、做理疗，而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已经接近晚上8点，根本没办法及时为她们做饭，不得不点外卖。正上初三的女儿主动请缨：“爸，奶奶有我照顾，你只管干好工作，其他的不用操心！”从此，女儿挑起了家务的重担，除了紧张的中考备考以外，还要做全家的晚饭，所有家务活儿都会干，我虽然看着高兴却是疼在心里呀。一年后，上了高中的女儿有一次病倒在教室里，却没有给我打电话，事后班主任微信发来了女儿的作文：“我的爸爸是一名老实勤恳的扶贫干部，作为女儿我要给他最大的支持……人民的需要就是他不忘初心的选择！”女儿写的一字一句让我这位中年男人湿润了眼眶……

2018年夏天，正是任务重的时候，我肾结石发作每日尿血，但报告要交，领导发言稿要写，迎检的台账要整理出来，工作不能停。没办法，我就一把一把地吃去痛片，熬着继续工作，直到疼得满地打滚，才被同事们送去了医院。接下来的一周里，晚上我在武昌的湖北省武警总医院住院治疗，天一亮就赶着到汉口金银潭的单位上班，医生让我请假住院做手术，我怕耽误工作选择了微创手术，术前消炎不到位，结果造成手术不彻底，现在还留下了后遗症。术后第二天我就返回机关投入到了工作当中，管床的医生护士都觉得我很拼，但我知道自己只是扶贫工作者的一个缩影，牢记使命精准扶贫离不开党员干部的情怀与担当。

战疫情，两手都要抓实

疫情期间，下沉社区分配给我的主要工作是搬水，还有一个头衔“水师傅”。除了“水师傅”，社区里还有“菜师傅”“肉

师傅”“药师傅”等称号，大家都忽略了容颜和报酬，有的只是鼓励、温暖、信任和希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云开日出时，一起到武大看樱花！然而，我这个“水师傅”同样牵挂着对口村的情况。时时关注驻莲花塘村扶贫工作队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况，协调并调整一名驻村工作队员；了解片区各驻村工作队防疫期间驻点村帮扶情况，找领导申请拨付专项资金5万元作为莲花塘村疫情与扶贫经费；配合驻村工作队做好疫情期间全街贫困人口走访、统计和帮扶工作；协调局里给村里捐酒精、口罩、化肥等物资，村干部都称呼我为贴心的“屋里人”……市教育局对口莲花塘村驻村工作队疫情期间工作于3月31日在“学习强国”上登载。

我深知，我只是广大扶贫工作者中的一员，但我的身上必须体现出广大扶贫战士奋勇担当的风采。在整个脱贫攻坚工作中，让我们泪流满面的人，很多是那些我们过去很少关注的“小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有尊严、有价值，而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在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脱贫攻坚史诗”里，应该有他们的故事。我们教育扶贫人将继续按照各级领导对教育扶贫工作提出的要求和希望，在相关领导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各级部门沟通协作，巩固现有脱贫成果，优化各界扶贫资源，积极提升扶贫成效，不断增强“造血”功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殷国俊：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副校长，市教育局扶贫办专职副主任）

我的路

◇ 龚九宏

我是龚九宏，是武钢有限焦化公司机械技能大师，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央企劳模、央企优秀党员、武汉工匠等荣誉称号。针对生产难题，我开发实用新型专利，获得了31项国家专利，自主开发的“管式皮带自动纠扭器”填补了国内空白，设计的“物料在线取样器”摘取了海峡两岸发明金奖，“单驱动可翻折皮带挡”荣获巴黎国际发明展银奖等多项大奖。我总结的“堆取料机料斗低空更换法”“配煤粉碎工艺先进操作法”等多项操作方法，降低了操作风险、提高了焦炭产量和质量。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平均每年完成35项技术攻关，创效数千万元，被评为全国机冶建材系统模范职工创新工作室。

参加工作多年，我一步步走来，走得很踏实，走出了自己的成长之路。

日积月累求知路

我是伴随着钢铁发展成长的“钢二代”，打小就羡慕那些蹬着单车上下班的钢铁人，也因此在他们劳累的身影下萌生了“为低端劳动者改善劳动强度，增加安全砝码”的理想。1991年，技校毕业的我，被分配到武钢焦化公司从事设备机械维修工作，自认为学有所成“身怀绝技”，可以傲视天下。

“焦化不就是把煤烧成炭嘛。”对当时的工作分配虽有抵触，但我还是如期报到了。一进厂区，就被那里特有的味道熏得难以呼吸，我的师傅看出了我的怨气和傲气，扔给我一支笔一个本，带着我到翻车机巡检设备。“这是铁靴，这是铁牛，这是皮带闸……它的作用是……”师傅的介绍令我目

瞪口呆，那些书本上根本就找不到名称的零部件，那些故障判断及处理方法等等，着实让我吃惊，这一盆“凉水”让我逐渐清醒。跟随着师傅沿原料输送生产线“上天入地”，由翻车机下到地下几十米的通廊，再由一条一条长长的皮带机攀爬到“天上”几十米高的煤塔，4个多小时的设备巡检，让我疲惫不堪。由高处俯瞰厂区，那一片井然有序的生产风景线深深吸引了我。碳化室中推出火红火红的焦炭，炉台上挥汗如雨作业的工人，原来我们是那么渺小，但小小的我们都有各自的作用，我找到了自己，找回了钢铁报国的初心。

调整好心态后，我再次积累起年轻人的冲劲和拼劲，高标准、严要求，拿起工具苦练挫、刮、锯、錾等钳工基本功。日常检修任务较饱满，腾不出练习时间，我就下班后按照师傅教的方法反复操作，展开图纸仔细琢磨，直到熟练为止。我坚信，任何工作都有奥妙之处，不懂可以学，即使有困难，只要愿意花更多时间，总能把它学会做好。

渐渐地，我的基本功有了一定进步，对设备性能结构也有了一定了解，但由于缺乏临场经验，时常会出现设备故障“问诊”不细，“把脉”不准，将对中跳动诊断为失衡震动，将压力损失诊断为气流涡动，甚至出现对尺寸精度把握不准导致联轴器安装不到位的尴尬局面。

师傅没有求全责备，每次都拍拍我的肩，帮我

分析原因，指导我把每次检修时的数据、处理方法等都点点滴滴地实时记录下来。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日子一长，我对各种设备的“脉搏”烂熟于心，碰到类似的问题，当师傅们还在讨论时，我已经知道该如何去安排作业。

一次春节长假期间，瑞雪将大地打扮得分外妖娆，正常作业的堆取料机突然罢工。接到生产一线求援电话，我迅速离家赶到现场，大伙正围着瘫痪在雪地里的堆取料机分析故障原因。“液力耦合器失效？”“减速机行星架移位？”……我结合斗轮驱动机构工作原理和故障现象，准确判断是花键磨损导致斗轮轴打滑。原因找到了，棘手的问题也应运而生，更换斗轮轴需要30多人花5天时间才能完成，当时正处新春佳节，把大家从家里拉出来，于情不忍。冰天雪地集团军立体交叉作业，安全风险高。钢铁行业是流水线作业，不能因为某个环节出问题而



2017年10月18日，龚九宏巡检武钢焦化公司原料分厂卸料作业区的翻车机并现场判断设备故障

导致全线停产。经过认真分析核算，我大胆采用现场开槽、嵌入焊接筋板方法，现场5个人仅用6小时就排除了故障，堆取料机恢复正常生产。雪还在继续飘，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我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随着企业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和科技进步的发展，我感到了自身知识的缺乏，这促使我先后参加技师、高级技师培训，不断提升专业技能，并通过技改工程虚心向设备生产设计单位学习。

液压设备是公司技改后引进的新设备，当时公司无人知晓该怎么维护保养；生产厂家委派实地调试的师傅，由于不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当班时一言不发。我跟班作业，每每提问时，委派师傅就说：“跟着我干，你看着就好。”为了撬开师傅的嘴，我自掏腰包每天买好矿泉水递上，师傅慢慢变得和蔼了。我琢磨，矿泉水不解渴，出汗量大，还是喝茶好，于是又买了个茶杯，每天给师傅沏上茶，奉上香烟。师傅被我的诚意感动，就告诉我，他在小旅店嘈杂的环境下休息不好，所以脾气有点大。了解真相后，我立即和家人商量，把师傅接回家住，家里人口简单，伙食就按师傅的口味做。就这样，师傅在我家住了月余，我们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晚上在家摊开图纸逐级分析，白天在现场一一解答。设备投产后，我们对这台进口设备也了如指掌了，这离不开设备调试阶段厂家师傅的耐心指导。

当时，我跑遍了武汉三镇的书店寻宝，最后，还是在成都出差时买到了我的有关液压设备的第一本书。我至今仍把这本书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以此鼓励自己一往无前。

为了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我报名参加了中国地质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习，并取得大专文凭，由单纯的机械专

业，成长到能将机电仪综合起来分析设备问题，并勇于向专家挑战。

液压双车翻车机是原料入口关键设备，投产初期故障频发，平均每个月出现13起集成块撞毁故障，恢复起来极为困难。一次次碰壁后，一个新的设计思路在我的脑中清晰成型，可是翻车机设计单位一纸传真说，不可以，对我的设计全盘否定。我静下心来，反复运算、试验，进一步分析改造措施的理论依据及现场可操作性，最终利用翻车机大修的机会成功实现压车梁液压集成块移位改造。改造后的翻车机运行稳定，将原来每月出现13起故障降到了0。

学习促进技术进步，娴熟的技能和丰富的理论为我日后现场创新奠定了良好基础。

孜孜以求创新路

我的人生非常幸运，在入职初期迷茫时，得到了师傅的谆谆教诲，传授给我有效的学习方法，培育了我对职业的热爱。在成长过程中，刘幼生师傅点燃了我的创新激情，为我树立起感恩企业、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之心。

降低职工劳动强度，将职工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在刘师傅的帮助下，我人生中的第一项专利诞生了。

焦化公司很多大型设备都采用开式齿轮传递动力，为了保证正常运行，操作人员必须每隔两小时给齿轮涂刷一次润滑油，无论是烈日暴晒，还是风吹雨打，此项工作都必须及时进行，否则齿轮就会抗议、罢工。经过反复试验，我巧妙借用开式齿轮动力，采用连杆结构，成功研制出“无源自动润滑器”，使职工摆脱了每两小时加一次油的重复工作，同时延长了开式齿轮的使用寿命。

项目研发成功以后，刘师傅手把手指导我撰写专利交底书，并耐心讲解中国专利法和创新思路。在刘师傅的指导下，该项目被选送参加国际发明展，并一举摘取银奖。当宣布获奖名单念到我的名字时，我傻子似的半天没反应过来，刘师傅提醒我项目获奖了，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项目成功研发，对我来说，其意义不在于专利、获奖，而在于我突然明白、突然看清面前还有一条崭新的提升人生价值的创新道路。如今我拥有的31项专利都基于生产现场实际应用，其中有8项获得各级大奖。

堆取料机在堆料和取料不同作业模式时，需人工将悬臂皮带挡关闭或展开，职工上下攀爬皮带机，劳动强度大且存在一定安全风险。我组织班组同事展开课题攻关，灵活运用所学技能，自主设计摆杆式折转皮带挡，但由于铰轴间隙过大，摆杆行程损失较多，职工现场操作比较费力，因此，摆杆行程损失成了整个项目进展的一只拦路虎。我反复研究折转皮带挡的工艺要求，终于琢磨出一套较完整的加工程序，将铰轴一根根拆卸下来，进行表面敷焊、退火，自制“弯锉”对铰轴进行细心打磨，满足轴孔配合间隙。经过日以继夜的加工、试验，加工精度一点点向设计要求靠近，一周后终于达到精度要求，顺利应用于生产现场，降低了职工劳动强度，提高了设备生产效率，保障了职工人身安全。该项目于2019年在巴黎国际发明展上获得银奖。

发明属于思想者，譬如牛顿、瓦特、爱迪生……他们无不善思善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发明都来自于好奇心的驱使，而是勤思苦想探个究竟的结果。改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劳动对人性的压抑，让劳动轻松起来、愉快起来，从而改变机

器奴隶的现状，这便是我搞发明创新的潜在原始动力。

凝聚团队合力路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带动身边的职工，发挥团队的作用，形成合力，才能为企业奉献更多的创新成果，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2010年5月，“龚九宏创新工作室”挂牌成立。工作室围绕安全生产难题开展岗位自主创新，将技术交流、导师带培、职工培训、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贯穿于现场攻关的整个过程，在解决生产难题的同时，激发职工的创新热情。工作室每季度开展一次技术培训，每月组织一次技术交流活动，定期组织技师创新成果演示，技能上互相学习，技术上优势互补，成果共同分享。我们先后取得86项国家专利，完成技术攻关项目127项，为企业及社会培训学员3000多人次，工作室先后被评为武汉市首批技能大师工作室、全国机冶建材系统模范职工创新工作室。

为了实现低成本炼焦，我们研发出一套煤料选择性破碎操作工艺。这是个改进设备、改进工艺的项目，牵涉面广，不是一两个人能解决的，需要团队的力量。焦化公司工会、生产部和设备部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协调会就开了16次，认真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充分听取意见。为确保煤料细度达标，煤研所的原料检验结果每天会反馈到工作室，炼焦分厂焦炭质量数据每天上报，工作室随时做出正确的调整与修正。项目投用后，不仅每天节约电费1.8万元，而且煤料细度更适合炼焦生产，焦炉容煤量增大，一年可多生产22万吨焦炭。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还

将工作室与厂大学生协会联合起来，联手攻关，将高新技术与实用技术相结合，借用大学生的理论优势，提高攻关效率和科技含量，实现了优势互补、攻关双赢。这些成绩不仅凝聚着蓝领技师们的辛劳与智慧，而且展现出了一线工人的自豪与荣耀。

宝武集团公司成立后，我有幸参加工作室共建、创新日等活动，得到创新大咖们的指导和帮助，共同打造职工创新“航母”，共同组建宝武创新孵化园，让创新成果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力，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社会。

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宝武集团提出了构建钢铁生态圈，打造“亿吨宝武”的宏伟目标。在恢复产能提质增效的恢弘生产经营目标下，集团进一步加强环保投入，



2020年3月，龚九宏（右一）和社区志愿者一道把一位104岁的康复老人从隔离区接回家

通廊封闭、脱硫脱险、循环水利用、爱国卫生日持续推进，厂区空气清新可人，天空一天天蔚蓝，职工在撸袖奋斗中分享改革红利，在改革中有作为、有获得感！

无私传承培育路

在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中，我逐步成长为宝武工匠、武汉工匠，现在我也用自己的言行培养自己的徒弟们，16名徒弟分别成长为工程师、优秀工班长、设备专检骨干等。

在现场攻关过程中，我有针对性地培养青年职工，不断鼓励支持青工搞创新，与他们一起拓展创新思路，激发创新热情。在完成“管式输送带扭转检测装置改进”攻关课题时，我指导一名徒弟顺利完成专利申报，极大地激发了徒弟学技术、钻业务、搞创新的主动性。

不论是教学培训，还是带徒弟，都是自身提升的过程。编写课件时，我会发现自己的短板，通过查阅资料可以得到弥补。带徒弟时，青年人思维活跃，接受新知识快，我们可以相互学习。

起初做课件、画图时，我都只能用手写，特别是画图，不是不会画图，而是设计图需要反复修改，在原图上修改，看不清，画出新图，又看不出那些修改的地方，画N张图，不光耗费精力，而且要找到修改点，如海底捞针。小徒弟给我支了一招，把原图贴在圆玻璃小桌的下面，在玻璃桌面上修改，既大大减少了画新图的辛苦，修改的地方又一目了然，改得不到位，在玻璃板上擦掉重来。哈哈，真是绝招！

有了电脑后，我急切希望掌握电脑知识，便于在网上解决一些技术改造问题。刚好，公司招进了一批大学生，其中就有一位

计算机专业的，正好成了我的徒弟。我兴奋地对新徒弟说：“我们互为师徒，我教你现场实际操作，你教我电脑技术。”于是，上班当师傅的我，下班后当徒弟毕恭毕敬，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成为了电脑高手，徒弟也由一名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

利用业余时间，我又将自己的工作心得与理论相结合，公开发表论文，编写《钳工试题库》和《检修钳工实用读本》，并自编教案走上讲台，将毕生所学与更多人分享。

2011年7月7日晚，母亲因脑病复发送往医院抢救，我接到厂里设备故障求援电话，一面通过电话指导前方如何展开故障排查，一面嘱托妻子，随后立即赶到故障现场。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我发现这是一起不常见的油缸支撑环故障，不能按常规方法解决。我认真分析，现场制定方案，开展“外科手术”解除了故障，恢复了设备正常生产。因为这种故障太少见，我又立即通知相关检修人员连夜进厂，趁热打铁对更换原件进行解体分析，一一讲解自己判断处理故障的思路和经验。检修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我还是不厌其烦地一再解析，直到每位职工通晓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法。当我红肿着眼睛赶往医院时，母亲已永远离开了……

大爱助力抗疫路

2020年，一场无情的疫情打破了春节的喧嚣，武钢毅然担负起社会责任，一边防疫一边抗疫，一边保产一边支援，不仅顶住了疫情带来的压力，还确保了员工及家属的生命健康。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作为一名央企员工，我发动一切力量采购3万多元的抗疫物资，捐赠到省市各相关医院，并

捐款1万元，同时克服恐慌心理，义无反顾地当了一名抗疫志愿者，为抗疫助力。

志愿者审核，当时要求年龄不超过50岁，我刚好还差两个月，蛮幸运的。第一天跨出家门的那一瞬间我也曾犹豫过，也有恐慌，但武汉伢的犟劲让我壮起了胆，党员的义务让我担起了责任。我对家人谎称上班，晚上还要加班，可最终纸没包住火。“国家现在有难，我们可以捐款捐物，我们都在努力，但你一旦被感染就会影响一大家子人，还有我们的老父亲……”“有难一起扛，共同分担才更坚强，请让我为武汉保卫战再搭把手。”最终，在保证做好个人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我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抗疫中，身边的感动数不胜数，社区工作人员舍小家顾大家，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用娇柔的身躯，为社区居民拉起防护屏障，保障生活物资供应，接送医患……

一次，我到隔离区接回一名104岁的老奶奶。她思维敏捷，沿路感谢志愿者、感谢政府、感谢党！到家后，他们全家人集体向我们鞠躬，这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身为武汉人我们是自豪的，身为中国人我们是幸运的，身为志愿者我们更是骄傲的。

如果每个人爱上自己的工作，企业就会有发展，社会就有大进步，风雨中凝聚民族的力量，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赢！愿山河无恙，人民福康！

（龚九宏：宝武集团宝钢股份武钢有限焦化公司机械技能大师）

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历程及其启示

◇ 周国林

我认识张舜徽先生是在上大学期间，那时他已60多岁，历史系没有安排他教学任务，我们是在系里学术报告会上听到他的演讲，对他的学术成就有所了解的。1979年，我有幸考取张先生的研究生，向他请教的机会就多了。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共6人，张先生很关心我们的学业。记得他亲自到汉口的古籍书店，买了6部白文的《四库提要序》发给我们，人手一册，要求各自标点，并抄写一遍。有不懂的地方，他再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至于每个人不同的要求，他也尽量满足。我那时因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想参考兰州大学赵俪生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该书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只有内部印刷本，张先生得知后，立即写信给他兰州大学的熟人，请熟人借了一本邮寄过来，供我使用了一个月，然后再由张先生还回去。在张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顺利地完成了硕

士、博士期间的学业，走上了史学研究之路。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我对张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现在有关方面约我写一篇回忆张先生的文章，我感到义不容辞，又不知从何处着手。想来想去，还是从张先生早年的《壮议轩日记》说起，谈点对张先生学术历程的认识吧。

爱日以学 确立毕生追求目标

《壮议轩日记》是张先生1942年到设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后教学、科研和生活的记录，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在兰州大学任教时期。整部日记在南北转徙中散佚，幸亏其中一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为湖南图书馆所收藏。1984年，张先生获知这一信息，商请湖南图书馆寄往武汉一阅。见到40几年前的日记，张先生

“省览之下，百感交集”，回信致谢，并寄还日记。从这件事中他体会到，书籍文稿还是放在图书馆保存最可靠。于是，在1991年湖南图书馆湖南名人文库寄去求取著作、手稿的信函后，张先生于1992年回信，表示很想将平生校点的书籍、撰写的手稿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文件加以清理，概送家乡的图书馆保存。经过几次商谈后，11月26日下午，他同湖南图书馆办完身后所有资料交接的手续。次日凌晨，张先生便溘然长逝了。冥冥之中，《壮议轩日记》好像已把张先生同湖南图书馆连接起来，给湖南图书馆捐赠有关书籍、手稿的交接事宜成为他生前最后一件操心劳神的事。1994年12月，在湖南图书馆建馆90周年之际，我陪同张先生子女前往长沙参加张先生捐赠书籍手稿的仪式。征得张先生子女的同意，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复制了残存的所有《壮议轩日记》。自此，因研究与出版之需，这部日记我多次通读，从中认识到张先生的学术路径和治学精神，也理解了他一生的学术取向和人生态度。

勤奋的治学精神，是日记给人的第一印象。在到蓝田镇的第二天，张先生就到学院图书馆浏览，“随取孙籀廌、俞曲园书数种，假之以归”，“夜阅《籀廌述林》，至二更后”。紧接着几天的日记，又有“夜阅《白华前稿》”“阅《白华前稿》颇有所悟”“夜阅《铁桥漫稿》”之类的记载。在1942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话：“朝食后赴图书馆，欲从假《东都事略》《续通鉴长编》《系年要录》《宰辅编年录》《三朝北盟会编》，皆无之。自《宋史》外，惟假得毕氏《续通鉴》及《宋史纪事本末》二种耳。居此穷乡，求一常见书不能得，虽日饫酒食，无以疗饥渴。此吾所以发愿于乱

定后作十年漫游也。”在他心目中，读不到想读的书，再好的酒食都“无以疗饥渴”。在1946年到兰州大学后，读书境况大为改观。当年10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派人到甘肃省立图书馆借《受祺堂文集》《二林居集》《亦有生斋集》等十种书，“俱取以来，自此闭门兀坐，足以疗饥，十日之内不需他粮矣。”闭门家中坐，以书为粮食。昔人称“嗜书如命”，亦不过如此。11月8日，他给一位学生写信，鼓励学生“寄情卷轴，尚友昔贤”，他是这样说的：“自来兰州，甫四十日，穷昕夕读吾所应读之书，又已逾二百卷。闭门谢客，汲汲孜孜，惟日不足，所得亦益以宏富。使吾而处京沪四达之区，耳目炫乎纷华，心智荡于征逐，而能专意致思若此乎？”他认为即使生活环境差一点，只要能专心读书，那就是有福之人。

自然，张先生读书不是一味贪多，而是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早年他读过张之洞《书目答问》中“由小学入经学，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其史学可信”一段话后，领悟到做学问是有次第步骤的，故在文字、音韵、训诂学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年过三十，便转到经史之学。日记中，时常可见他“经史有用之书”“经史根原之地”的说法。他回忆说，少时气盛，立志在30岁前把二十四史读一遍，凡唐以前正史都遍加丹黄，无一字跳脱，却因丧乱转徙而中辍。到了蓝田，他决心读完宋以下正史。为此，他尽量搜罗宋代史书，与《宋史》对读，每天都有一定的任务，称为“日课”。他评价明人归有光《宋史论赞》中“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的话是“通人之言”，以之激励自己。由于“严立课程，如幼童时读书景象”，张先生终于在1944年即33岁时，通读完全史，写出札记数十册。

除了学术部类上的循序渐进，对一些大部头的子部集部典籍，他也有计划地系统阅读，积累见识。如严可均所辑746卷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帙浩繁，张先生在湖南时已经大体翻阅过，而将其与1000卷的《全唐文》放到一起研读，是到兰州之后的1946年冬至1947年春。阅读也日有定程，并将其领悟记录到《壮议轩日记》中。令人惊异的是，把这些幸存下来的日记同张先生1988年出版的《读文劄记》对比，文字竟然基本相同。这表明日记中的心得已经是深思熟虑的学术见解，按照一定的体例组合为文，只需要简单的摘录和适当的文字调整，这不能不说是读书与作文之间最便捷的方式。

系统的阅读过程中，张先生的研究重点逐渐形成。他认为做学问要广博，而不要杂。他有如下博杂之辨：“不博则如终身整洁一室，而不览天下山川之美；若涉于杂，则终身彷徨道路，而绝无一室家之安。近人乃多以杂为博，失之远矣。”又说：“治学有宗旨、有归宿，凡所应知之理无不究览，是之谓博。无宗旨、无归宿，遇书辄看，记问馱多，是之谓杂。学不博则陋，学太杂则苦。譬之出处必先有庐舍园池，而后周游天下以穷耳目之胜；晚岁归来始有室家之安。苟自少而无乡井之托，终身荡游于外，见闻固已周矣，投老竟无所归，此杂之害也。由博返约，其成功易；泛滥无归，未见有能成功者。”他强调治学要有宗旨、有归宿，有这个前提书看得越多越好，否则就是驳杂，泛滥无归，就像个无家可归的人似的。因此，他在30岁左右时，就在思考自己的努力方向。当他阅读梅县人李崇元《清代古文述传》后，“有志撰《清代学术述传》，藉以考镜三百年学术迁革。”虽以涉览未周没有立即

动笔，但原来所作章学诚、翁方纲两传已得通人首肯，“踵此而黽勉图之，庶几其有成也。”后来，他出版的几部清代学术方面的著作，都是年轻时打下的基础。

还有一些年轻时形成的研究课题，成为他终身的研究对象。见过清人陆世仪《思辨录》中“续经”之议后，张先生服其见识之卓，联想到眼下，以为“今日所宜从事者有三焉，修通史一也，纂诗史二也，续修《通鉴》《通考》而汰其不切于今日者三也。”后来读到马一浮的《复性书院简章》，对其编纂计划有所议论，且谈到自己的规划：“余旧有志撰集《经子粹语》《史传简编》二书，以为振民育德之助。”这两段话中的“修通史”“撰集《史传简编》”，都是指的普通民众能够读懂的简明通史。他一生念兹在兹，终于在40多年后写出《中华人民通史》，于1989年出版问世。至于第二段话中的“撰集《经子粹语》”，他勤于辑录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经传诸子中的大量名言，在晚年定稿为《经传诸子语选》，后由其子女编入到了张先生的《霜红轩杂著》中。学术研究中这种连贯性和大局观，使张先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学术思路从未间断，也使他始终掌握着自己科研项目的主动权。

与时俱进 坚持唯物主义史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先生的学术事业进入崭新阶段。据其侄子回忆，张先生在湖南和平解放后，认识到知识更新的重要性，就主动同湖南省的统战部门联系，得到了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的机会。1950年，他在政治研究院史地组系统学习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51年春，他被分配

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后随学校转入华中师范学院。从此，他在这里工作了40多年。

一年的学习，反映到学术上，是关注学术界热点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撰写《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材料问题》，发表在《新建设》1951年第3期上。这是他进入新时代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谈到古代史材料使用中的四个问题。其中提到在1950年3月《光明日报》学术副刊关于周代殉葬制度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周代殉葬者数量不大。张先生举《墨子》中《节葬篇》“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的记载，说明周代人殉的普遍性。张先生后来回忆，这篇论文发表后，《新建设》后来讨论人殉问题的学者，才注意到《墨子》上的材料，纷纷征引。这表明在新旧时代转换的过程中，张先生发挥出自己资料见长的特点，一出手就能见人之所未见。尤其是他在考虑殉葬制度时，是同古代社会分期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认为殉葬只是上层建筑里极小的制度，绝不能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特征。这显示出张先生已经融入当时的学术主流，熟练掌握了新的话语体系。

在研究过程中，他很注意时代的需求。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后，不少人士仍然留恋过去的“正体字”，还有人认为汉字简化有损固有文字的尊严，或者担心今后继承文化遗产发生阻碍。张先生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马上撰写了《从汉字发生、发展、变化的史实，说明今日实行字形简化的必要与可能》一文。文中提出三点，一是在造字和用字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祖先尽量地采取了简体

字；二是在长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严密压制的情况下，竟消灭不了简体字；三是“文字必须为大众服务”，在50年前便已有了响亮的呼声。这些论证说明：“进行文字改革来简化字形，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办到的，而是符合于事物发展规律、与客观需要相适应的必然结果。”这些论述，我们在60多年后看来，仍然感到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张先生是忙碌的，也是很充实的。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史论文集》《顾亭林学记》三部书，还基本完成了《清人文集别录》等书稿。这些著作的分量，学术界早有定评。他的《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也写成于这一时期，书稿现收藏于湖南图书馆，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尝试。全书分6册，每册各有标题，分别为“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方法”“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受压迫人民的痛苦”“封建社会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文献”。从这些标题可见，张先生信守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并据以阐述中国历史，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张先生格外突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1956年，他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一书。他在作于该年除夕的《序言》中说：“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人类文明，是无数劳动人民经历了若干年代集体创造的结晶。不认识劳动人民祖先集体创造的各方面成就，便无由了解人类的真正历史。我国过去旧的历史书籍，浩如烟海。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统治阶级来写作的。有关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活动的史实，记载独少，或者载而太略。”因此，他在确定

研究工作方向时，强调了考证劳动人民祖先生活活动的重要。书中是从 11 个方面表现劳动创造一切的，即：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在生产斗争实践中所取得的知识；丰富了饮食的内容；生活资料的多方面发展；生活资料的进一步美化——艺术品的出现；努力改变自然环境，使生活过得更好；创造出保健的方法，使寿命更延长；有了疾病是怎样去治疗的；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字；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学；怎样出现了书籍。而在每一种创造下，又有 4 至 9 个细目。这些相当具体的描述，就把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个大题目落到了实处。在他之前，还没有学者做这样具体而通俗的考证工作。

他重视劳动人民的历史观，使他把早年拟定撰写的《中华通史》重新命名为《中华人民通史》，并在 1987 年即 76 岁时完成。他在序中写道：“在很早的时候，我便有意自创新体，试写一部《通史》，务求简明易懂，便于广大人民阅读。首先，我感觉人民为历史主人，围绕人民来进行叙述。其次，过去编史的先生们，每将几个相近的朝代联在一起讲，将治乱兴衰讲完以后，继之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这样循环往复地讲下去，致使读者看完一段有关文化的记载之后，又继着要看一段争夺相杀、战火连年的记载。知识既无系统，记忆也就很难。在打破王朝体系后，应以事物为记载中心，将历史上重要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讲个清楚，务求使读者从中得到系统的知识，以激发其爱国之心。”这段话既谈到《中华人民通史》的写作目的和写法，也将其以人民为历史主人、把历史写给人民看的情怀展现出来。

以上以《壮议轩日记》和张先生 20 世纪 50 年代的著述为线索，对他青壮年时期的治学历程进行大致的勾勒。这是他年富力

强的阶段，取得了不少令人羡慕的成果。他的经历后人不可复制，但有不少有益的启示是值得汲取的。像青年时期的勤奋，尤其是他青年时期的远大规划使他终身受益。可以说，年轻有自己的长远追求，才能真正称得上“三十而立”。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学习，跟上时代步伐，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贯穿于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在晚年总结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用文字写成的作品，不外三大类：一是抒情，二是纪实，三是说理。由三者发展起来，便成为文学、史学、哲学，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部类，而史是其主干。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率一切，然后研究文学、哲学，不致放滥无归。”这不是他一时兴起之言，而是他一生经验之谈。后世好学深思者，于此心领神会可也。

（周国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曾为民族文学鼓与呼

◇ 何联华

改革开放初期，中南民族学院复办，我有幸被调入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任教。调民院之前，有朋友给我分析说：“去那里，第一业务上没奔头，他们是以培养民族干部为主的；第二你不是少数民族，在任用上没有优势。”1980年8月暑假的一天，我到桂子山东边“十二家”平房里，拜访了民院老院长白瑞西同志。交谈中，他对我说：“民院才筹建（复办），刚搭架子，各方面条件很差，困难很多，但发展前景是美好的，欢迎你到那里与我们共同创业。”当时，严老（学窘）也在座，说了热情欢迎我到民院中文系任教的话。9月中旬，我就参加了民院中文系的教研工作会议。下面就讲述到民院后，我所经历的几件有关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的事。

编写民族文学新教材

到民院后，学校有关领导同志希望我参加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这项工作的立项得到了党委书记兼院长白瑞西同志的大力支持）。此前，我是搞现当代文学的，没有搞过少数民族文学，但我还是同意了。没想到的是，第一项任务就是要我“走西口”，去大西北搞调查，调查那里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情况。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件陌生的全新工作。不过，我没有退缩，安排了一下家小，就于1982年8月的一天，手持中南民院的介绍信，一个人奔赴陕西、甘肃、新疆等民族地区。每到一地，我首先就去拜访当地的宣传部、

文联、作协等单位，说明来意，请他们介绍本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情况，给我提供一些有关对象的创作信息。他们大都非常热情，不但介绍情况，而且指派懂少数民族语言的同志陪同，这给我增添了许多信心和力量。经过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调查、走访、翻阅资料，先后同少数民族的几十位诗人、作家、学者及文联的有关领导同志进行了交谈。如我曾走访过东乡族诗人汪玉良，藏族诗人伊丹才让，维吾尔族诗人吾提库尔、克里木·霍加，乌兹别克族诗人泰来提·纳斯尔，以及曾出席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拜会过斯大林、写过著名长诗《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的哈萨克族诗人库尔班·阿里等等。除了到有关单位、机关访问民族作家之外，有时还深入到他们的家里去拜会。比如，我就曾到过维吾尔族作家柯尤慕·图尔迪、哈萨克族作家贾合甫·米尔扎汗和锡伯族诗人郭基南的家里，他们还用民族饮食热情地招待过我哩。在许多民族作家、诗人和文联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终于满载而归，除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邮回学校几大包资料之外，我还带回来几大捆有用的书籍、刊物及打印、手写的各种文字资料。回学校后，我将大西北之行的情况和感受，向学校教务处和校领导做了汇报。

又经过一年的努力，编写组各位同仁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编写任务。1983年6月，我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统稿人的身份，同主编李鸿然教授一道，带着编写提要和部分书稿，到贵阳花溪去拜会已接受我们聘请担任《史稿》一书顾问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民族文学》杂志主编、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请他对我们的书稿内容和整体框架提些意见。

我们在花溪呆了一个星期，几次听取玛拉沁夫提出的不少好的意见，还结识了不少民族作家。他还在当年11月给我写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我撰写的稿子表示赞许。

我们中南民院组织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这项工作本身，早已得到了民族作家们的普遍欢迎和赞同，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我到甘肃调查时结识的时任甘肃文联副主席、著名的东乡族诗人汪玉良，他在1984年3月21日给我的来信中，就热情地赞许道：“你们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我深信中国文学史将会由于这项工作而变得完整起来。少数民族人民一定会记住你们的功绩。你们的辛勤汗水定会闪出历史性的光辉。”这些话语令我感动，也的确代表了许多兄弟民族作家们的共同愿望和心声。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一书，经过1984年秋的专家审稿会后，终于在1986年年底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的好评，被称为“建国以来第一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并荣获国家民委1989年颁发的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招收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生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运用编写教材、调查研究和搜集到的许多资料，并学习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陆续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教学讲稿，先后给民院中文系1988—1995级本科生讲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给他们传授民族文学知识的同时，激发他们对民族文学的兴趣，并提高他们的民族

自信心和自豪感。1996年6月的一天，一位名叫钟建波的畲族学生送给我一份刚印出来的《中南民院报》，上面刊登着他的一篇题为《最后一课》的散文。原来这是他上周听完我给他们班讲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最后一节课后，抒写他即将毕业离校时对母校的依恋之心和对老师的感激之情。看后，我十分欣慰和高兴，感受到了少数民族学生的真诚和纯朴。

我还给1993年教务处招收和主办的民族助教班的学员上过课，给他们讲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记得学员中除了本校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如白灵阶、沙媛、张金玲等人之外，还有从云南等外地来的青年教师。

自1995年起，经学校和中文系领导的安排，我又鼓足勇气接连招收了两届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1995年到1999年，我的主要教学任务就是带研究生。两届研究生共计5名，第一届是王芳（回族），第二届有胡丹（侗族）、韦炫（壮族）、韩可弟（回族）、张学书（土家族）。除了给他们讲授主修课《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民族文学理论课之外，我还邀请中文系的张永仁、祝注先、杨传鑫、章绍嗣、曾俊伟等教授，给他们开设《老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当代西方文论》《沈从文研究》《中华文化》等课程。此外，我还带领和指导他们参与了一些有意义的专业实践活动。比如，观看湖北电视台拍摄的反映汉江流域、荆楚大地广大城乡改革开放后历史巨变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汉江潮》，参加座谈和评论工作，他们撰写的文章被收进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江潮〉评论选》一书中；参加大型民族读物——《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的撰稿工作，他们

的文章经我审阅修改后都被收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中；参加湖北地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现状的调查工作，他们调查的部分材料被我吸收到了我所撰写的《湖北少数民族文学的回眸与展望》一文中，该文被收进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的《跨世纪的湖北文艺》一书中。除了上述活动之外，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指导他们认真撰写各自的毕业论文，他们分别在1998年和1999年通过了以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作协主席、著名土家族作家、编审李传锋为首，校内的王朝彦、刘宝俊、何红一等教授组成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并都获得了硕士研究生学位。

宣扬民族文学

1989年年初，我在中南民族学院高教所的学术刊物《民族高教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发展民族文学事业，培养民族文学新人》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以“民族文学”作为民族学院中文系的“拳头学科”，用它去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以文学创作实践为基点，同民族地区结合共同举办“作家班”，让学生一毕业就能用他们的笔，去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梦想。这个设想虽然只是一孔之见，但代表着我为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而呼唤的一份担当和心愿。同年，当我校姚纪彭老师参与主编的《土家族文学史》公开出版后，我立即给予了热情的赞许，不但在民院校园里发出了呼声，还在学报上发表了《评新近出版的〈土家族文学史〉》等文章，并且在湖北省民委主办的《湖北少数民族》上撰写了推介文章。

20世纪90年代初，我看到辽宁大学有学者拟编一本名为《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

览》的目录提纲。目录中将“少数民族文学史”既不排在从古及今的“通史”类栏目里，也未放在按朝代时序划分的“断代史”栏目中，而是将其编到“各体文学史”一类，并同“妇女儿童文学史”排在一起。我对此大不以为然，于是给两位主编去了一封长信，表述了我的民族文学史观。后来，这本80万字的书于1992年6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编者在《后记》中对我的观点作了这样的回应：“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几百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为我们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中南民族学院何联华教授来信中，就少数民族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与此同时，我还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1990年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呼唤着历史》。文章从当代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价值被普遍忽视或轻视的现状出发，提出不仅要努力加强对当代民族文学的研究和评论，而且还应转变偏狭的文学观念，尽早编出包括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多民族的《中华文学史》来。

20世纪末以来，我不仅在国内各种场合和大小刊物上为民族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呐喊，而且力图向海外华人和外国读者推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1996年6月的一天，我应学校外事办的要求和高教所霍文达教授之请，由外语系袁雪芬老师任翻译，在科技楼向来访的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学者吉姆·格林洛博士介绍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有关情况，回答了他提出的十几个问题，向他赠送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

稿》。经朋友介绍，我还直接向海外华社刊物撰稿，畅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情况。如将题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丰收》的学术论文，寄给了马来西亚的陈思庆先生主编的华社刊物《资料与研究》，在1998年5月全文刊载。次年8月，这篇文章又被马来西亚陈雪风先生主编、华社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学新走向》一书全文收录。更令我高兴的是，同书中收录的文章大都是国内各个学科领域里素有研究专长的教授、学者、名流所撰写。

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庆生教授主持编写“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并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其中首次增加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小说”一章。呐喊十多年的让当代民族文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机会来了！经过中南民院邹建军教授推荐，王教授特地邀请我来承担这一章的写作任务，我愉快地接受了。经过几个月的撰写、修改、打印、校对，写出了初稿，送请主编审阅。王教授看后亲自给我回信，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我又反复修改、润色，终于完成了包括“少数民族小说发展轨迹”一节在内共三节文字的撰写，写了益希单增、扎西达娃、阿来等藏族作家的小说，柯尤慕·图尔迪等维吾尔族作家的小说，霍达等回族作家的小说，陆地等壮族作家的小说，三节计约两万多字。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计86万字，2003年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从2003年到2015年已重印多次。中南民大中文专业的各届学生，也都一直使用着这本高校通用教材。此前一直被人漠视和轻蔑的“当代少数民族小说”，

终于经过我的手，将它以专章的形式写进了作为高等学校通用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了！

讴歌民族文学新腾飞

从1982年编写《史稿》到我完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民族文学章节，其间经过了20年时间，我在教学与研究中积累了不少当代民族文学方面的各种资料。除先后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民族文学研究文章之外，也有不少的文字尚未发表。

为了总结研究经验，就教于专家学者，继续探讨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的问题，1996年，我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学术专著《民族文学的腾飞》，这是一本民族文学理论探讨集。它从民族文学史论的角度，分别对民族文学地位、民族文学批评、民族文学史著以及民族文学交融等方面，勾勒出了我国民族文学的基本理论架构。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校内外的报纸都发了消息和评论，尤其是时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著名白族诗人和民族文学评论家晓雪先生，在1997年10月7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读何联华〈民族文学的腾飞〉》的长篇评论文章，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作者“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做了认真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建设性、创造性的工作”，说该书是“近年来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突破，对今后进一步努力建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很有价值和意义。”1998年10月，在兰州举行的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学

术研讨会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颁奖会上，该书荣获优秀成果奖。

斗转星移，30多年转眼过去了。回首我从事民族文学教学和研究时一路走来的许多沧桑故事，如今都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但是，它们确实是我人生的足迹、生活的烙印、心灵的纪念，并且也是白院长等老一辈民大人坚定信念所给予我奋斗动力的一种明证：即证明当年我调入中南民族学院并投身于民族文学事业的抉择是明智的；这个抉择，圆了我献身于民族教育的梦想，实现了我为民族文学鼓与呼，并使少数民族文学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争得一席地位的愿望！

（何联华：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爱是不计回报的坚持

◇ 范红华

2020年9月9日，在武汉天河机场，我目送着女儿尼玛拉姆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涌动起无限的深情。

原本，我们母女素不相识。2009年10月，我把西藏孤儿尼玛拉姆从雪域高原带到武汉，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演绎了一份跨越民族、超越血缘的母女深情。如今，雏燕已展翅，尼玛拉姆被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西藏大学舞蹈表演专业录取。这位生在西藏长在武汉的孩子，将在汉藏文化交流的广阔天地里舞出精彩的人生。

我要给她真正的母爱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热心参与慈善公益活动。2007年7月，我与几位青年企业家来到武汉市对口支援的西藏山南地区乃

东县，在那里捐赠20万元援建一所希望小学。也是在那时，我与这个藏族女儿尼玛拉姆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我被乃东县贫困的现状深深震撼，希望结对帮扶那里的孩子，当地的援藏干部向我推荐了尼玛拉姆。据介绍，那时年幼的尼玛拉姆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姨妈生活。但姨妈仅靠8亩地维持全家生计，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我当即决定与尼玛拉姆结为对子。回汉后，我定期为她寄去学费、生活费、小礼物，还不时与她通话，联络感情。

2009年10月3日，在西藏参加援建希望小学活动时，我和尼玛拉姆第一次相见了。眼前这个瘦弱、满头小辫儿乱七八糟的女孩，一下子击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看着孩子怯生生的样子，想到她父母双亡

的不幸身世，我决定，“要把她带到身边，给她真正的母爱。”赴汉途中，晕车严重的尼玛拉姆吐得厉害，我小心翼翼地给她擦拭、喂温水，浑然不顾呕吐物溅在自己身上。

从遥远的西藏来到湖北武汉，不管是文化习俗，还是语言交流和生活习惯都有一定的差异。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小尼玛拉姆有些自闭和敏感。“她万里迢迢跟随我来武汉，这份信任不能辜负。”为了让尼玛拉姆尽快适应新生活，我每周都带着她去汉口一家西藏餐厅，品尝“家乡的味道”；到了合适的年龄，安排她到台北路小学上学，并请专门的老师教她学汉语；我担心自己平时工作比较繁忙照料不周，还特意为她请了一位保姆，照顾她的生活，陪伴她说话和玩耍……

母爱是不计回报的坚持

整了整刚换上的干净衣服，摸了摸稚嫩红润的脸庞，在台北路小学、在武汉体育舞蹈艺术学校门口，目送尼玛拉姆雀跃着

迈进校门。十余年了，我坚持这样送女儿上学。在我心里，“母爱是不计回报的坚持。”尼玛拉姆这样坎坷的身世，我要给她更多的关爱。

在初中、高中的人生节点，我陪女儿一遍遍找合适的学校；女儿生病了，我彻夜守在病床旁；女儿练习舞蹈双腿酸胀，我给她悉心按摩。我把自己的银行卡捆绑在她的支付宝上，让她有当家的感觉。我还经常带她参加各种合适的活动、观看表演、与小朋友们聚餐、参加舞蹈比赛、陪她一起游泳和打羽毛球。点点滴滴，我都竭尽全力地让尼玛拉姆沉浸在一个有温暖有爱心的家庭环境里，尽可能让她忘记自己的不幸，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家里幸福的小主人。

在我的感召下，台北路小学教师宋佳妮、武汉体育舞蹈艺术学校校长邓燕萍等都成了尼玛拉姆的“爱心妈妈”。十余年的善良和爱，让尼玛拉姆从当年无助瘦弱的小女孩，成长为笑靥如花的花季少女。她说：“我曾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妈妈用爱心把我心头的大石头慢慢撬起。”



范红华和女儿尼玛拉姆在其西藏姨妈家门前合影。左图摄于2009年10月，右图摄于2019年6月

尼玛拉姆说，想做一只鸿雁

平日里，我还经常带着女儿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感受人情温暖，关爱需要帮助的人。从受助到助人，尼玛拉姆说：“妈妈教会了我，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我非常欣慰，在她幼小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有爱和感恩的种子。

每年至少回一次家乡，是我和尼玛拉姆的约定。每次往返，在西藏，尼玛拉姆绘声绘色地向小伙伴们介绍武汉的纵横湖泊、动车地铁；回到武汉，又兴高采烈地给同学们描绘西藏的草原戈壁、五彩经幡。尼玛拉姆说，她想做一只鸿雁，传递汉藏民族的情谊，做汉藏文化交流的大使。

而今，尼玛拉姆被西藏大学舞蹈表演专业录取，离她“鸿雁”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尼玛拉姆即将展翅飞翔，她内心也无比地感恩我这个武汉妈妈多年以来的关爱与培养。看到如今尼玛拉姆长大成人，作为妈妈的我内心也非常开心和激动，我为女儿的健康成长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感恩政府领导、社会各界以及亲朋好友多年来的关心支持和悉心呵护。于是，我带着尼玛拉姆重新走访了武汉市政协、致公党湖北省委、湖北省慈善总会、我自己的企业鸿华服饰公司……回到这些地方，再走走，再看看，对多年来关心支持她的叔叔阿姨们道一声感谢。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西尔维亚曾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是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我用十几年的努力付出养育了尼玛拉姆，呵护她成长，让她绽放生命最美的姿态；并用润物无声的方式，将这份爱

心在她的身上传递。相信当尼玛拉姆展翅翱翔的那天，她能作为纽带联结汉藏友谊；在未来的日子，她同样能将这份爱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们。

聚集能量，一路向暖

2020年1月9日，《湖北日报》以《汉族妈妈范红华与西藏孤儿演绎母女情缘》为题报道了我的事迹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网友热议。学习强国、中新网、《楚天都市报》、湖北文明网、荆楚网等媒体平台纷纷转载，我这个汉族妈妈收获了大量网友和读者的点赞。

然而我做这些事情其目的并不在于此。对我而言，慈善是一种习惯，社会的认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可以享受的荣耀和炫耀的资本，而是一种鞭策和鼓励，我只想力所能及地做一个表率，希望我们周边的人群里能有千千万万更多的爱心涌现出来，和谐社会，温暖人间。而且，爱心不仅仅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更是渗透在每一个细节里的齐心协力。

用善良回报善良，用暖意回馈暖意，爱是不计回报的坚持，这是我多年来秉承的信条。过往在我的感召和带动下，诸多有影响力的人士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积极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我经常说，“一个人做慈善力量是有限的，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跟自己一起做慈善，才能将能量发挥到极致。”

（范红华：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鸿华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在抗疫一线

◇ 董凌莉

2020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荆楚大地，在党中央的组织、领导下，全国医务工作者舍身请命、奔赴一线，誓要打赢这场疫情保卫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短短数天内全员总动员，将主院区、中法新城院区和光谷院区进行全面改造，最终开放了2025张重症床位，以用于收治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全院共有5000余名医务人员参与一线战斗。回忆其间经历的点点滴滴，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我该怎么办？”

武汉封城后，城市按下了暂停键，可风湿病患者疾病的困扰却无法暂停，他们迫切需要复诊和专业指导。作为湖北省医学会

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湖北省风湿免疫科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受疫情影响不能到医院就诊的风湿病患者尽一份力。

如何为因疫情和封城影响困在家中的风湿病患者给予及时指导？在新冠病毒肆虐的环境里，风湿病患者如何进行自我保护？带着“为风湿病患友做些事情”的迫切心情，我联合湖北省风湿免疫科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在疫情之初，快速编写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我该怎么办？——致湖北风湿病病友》的科普文集，文集内涵盖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皮炎和多发性肌炎、痛风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血管炎、系统性硬化症、原发性干燥综合征、IgG4相关性疾病9个篇章，1.4万余字的内容，从一般建议到分病种指导，为风湿病患者解疑答惑，

提出指导意见，成为疫情期间湖北风湿病患者遵行的“百科全书”，受到患者和家属的关注和好评。

除了科普指导，疫情期间，我还组织专科教授利用休息时间，积极开展“在线问诊”，为困居在家、不能就医的风湿免疫科患者进行专业解答。我的一位老患者在居家隔离期间发烧，她非常紧张，很担心自己得了新冠肺炎，导致长时间无法入睡，没胃口进食。当时同济医院刚刚建立视频问诊平台，她的家属了解后便通过视频门诊将这些情况与我进行了沟通，我根据她的临床表现、目前用药和接触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判断发烧可能和她的原发病有关，随后，我对她的药物进行了调整，同时也指导家属科学防护。经过治疗，这位患者体温恢复正常，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截至2020年7月，风湿免疫科这样的线上诊疗咨询服务已开展了千余次，风湿免疫医疗团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患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2019年3月，董凌莉（右一）带领科室医生查房

风湿病患者感染上新冠病毒，该如何诊断？

但仅有风湿病防治的科普还远远不够。随着疫情的发展，陆陆续续有风湿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住院，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主要是感染科和呼吸科的，我们风湿免疫科的许多医务人员虽然也上了一线，但不可能遍及每家定点医院。于是，我又组织湖北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和湖北省风湿质控中心的专家们写了《COVID-19疫情期湖北风湿病患者随访和感染防治的专家建议》（以下简称《防治建议》），对风湿病合并新冠患者的诊断给出建议。

与普通人群不同，由于风湿免疫性疾病本身的特点，许多风湿病患者病情活动的症状以及常见的合并症往往和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存在相似性，使得鉴别诊断在这一特殊人群中尤为重要。《防治建议》提醒临床医生注意：

不少风湿病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或非甾体抗炎止痛药，可能掩盖发热等症状。因此，医务人员在此特殊时期对上述情况需要提高警惕，结合患者的流行病学研究、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等综合分析。《防治建议》就风湿病患者感染新冠肺炎的诊断、鉴别、治疗、用药都给出了具体的建议。《防治建议》发布后，对抗疫一线、二线的医务人员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为什么编写这个《防治建议》呢？我们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随着人们对新冠肺炎逐步的认识，发现新冠病毒入侵人体以后可能会对免疫系统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引起炎症风暴，炎症风暴会对体内脏器有一些损害。我们多数风湿免疫病人都是免疫功能异常活跃、紊乱，其中一些免疫病就是由于炎症风暴的参与而导致的，所以作为一名风湿免疫科医生，我从风湿免疫病的角度对炎症风暴提出一些想法和观点。

二是根据一些体外实验证明，羟氯喹或氯喹在体外对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羟氯喹或氯喹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一个常用药，也是一个基础用药，我们对它非常熟悉，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陆续被尝试运用在新冠肺炎治疗过程中。我们风湿免疫科专家希望能够借助自己免疫学知识，在这个大环境下，对新冠肺炎的诊治能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陆续碰到了风湿免疫病患者罹患新冠肺炎的情况，其中部分患者病情很严重，而部分患者病情却很轻。由于通过个案很难总结出诊治经验，所以我们希望能汇集学会和质控专家们的临床诊治经验，针对风湿免疫病患者罹患新冠肺炎的情况，群策群力总结出一个推荐治疗方案。

带领风湿免疫科白衣战士们积极抗疫

“格物穷理，同舟共济”是同济医院的院训，也是我们与病毒战斗的写照。面对疫情，风湿免疫科倾全科之力，我们13名医生和27名护士义无反顾地奔赴一线，踏上逆行之旅：党支部书记涂巍教授身先士

卒，奔赴光谷院区一线；余毅恺教授不畏风险，战斗在光谷院区E3-2重症病房；王贝医生告别年幼的孩子，全力奋战在中法院区B12西重症监护病房；曾志鹏、陈余雪、陈雨等医生值守在高风险的发热门诊；专科护士长张子云奔赴中法新城院区重症及光谷发热病房，轻伤不下火线；病区护士长张利娟带领护理团队积极响应院方号召，以“同济速度”3小时内完成普通病房清理工作，腾空改建发热病房……60多天的抗疫日子里，这群可爱的白衣战士用责任感和专业素养书写了一部风湿免疫科抗疫史，他们守护着新冠肺炎患者的健康，也展示了风湿免疫科“战必召，召必至”的团队精神。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在紧张的医疗工作之余，作为一名市政协委员，我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从抗疫药物、患者管理到病理解剖，先后提交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湖北省风湿病患者等慢病患者管理的建议》和《关于推进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实行病理解剖的建议》，围绕科学防治新冠肺炎工作建诤言献良策，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董凌莉：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

我为毛主席开船

◇ 胡建平（口述） 王荣海（整理）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乘坐“W506”交通艇检阅武汉市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大军，并畅游长江。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畅游长江。

如今，当年为毛主席开船的战士胡建平回到武警武汉支队船艇大队。那时21岁的小伙子，现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看到毛主席当年用过的物品和留下的老照片，老人讲述起毛主席最后一次畅游长江的故事。

没想到有一天能为毛主席开船

武警武汉支队船艇大队这次邀请我回来，为大队战士讲述当年为毛主席开船的故事，我的内心很激动。

2020年7月9日，我专程从老家福建赶回熟悉的大武汉，如约来到武警武汉支队船艇大队，看到战士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仿佛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我走进

船艇大队荣誉室，老照片、老物件映入眼帘，当年为毛主席开船的一幕幕瞬间涌入脑海。

我从小在福建长大，后来在南海舰队当兵，是一名航海兵。1964年12月6日，我离开了广州，两天后，来到湖北省军区船艇大队。那时候自己是个青涩的毛头小子，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见到毛主席，并且为毛主席开船。但是这一天竟然真的来了。

1966年7月16日，那天是星期六，我记得清楚。上午8时20分左右，像往常一样，我们船队的党支部成员正在会议室研究下午的组织生活内容，突然一声电话铃响，打破了会议室原本的平静。时任湖北省公安总队副总队长陈福明打来电话，命令船队快艇迅速做好出航准备，有重要首长要坐船。我们会议室的成员都非常惊讶与激动，那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大场面，当时只知道有重要首长要坐船，但我和战友们并不知道是哪位首长坐船，更不会想到是毛主席。

由于任务紧急，队领导商讨后决定用W506艇，该艇是当时我们船艇大队最好的交通艇。艇长30米，宽5.5米，由安徽省芜湖造船厂制造，属于乙型水上交通艇。

不巧的是，那天周六，驾驶经验丰富的班长刚好请假外出，一时联系不上。队领导临时决定换人，在官兵中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刚刚加入党组织的我来开船，那年，我只有21岁。这个决定让我本就激动的心情又叠加了一层紧张感，真的非常意外。虽说我是航海兵出身，但在船艇大队还是新兵，刚到武汉两年，我很担心自己做不好，不能圆满完成任务。队领导一边鼓励我，一边安排其他战士协助我，我紧张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出航前，船队安排了三艘艇，我驾驶的W506艇是最大的一艘，它的代号也是有讲究的：“W”是代表湖北公安总队，“5”是我们船队编号，“06”是6号船。还有一个W505艇，比W506艇小一点。另外，还有个汽艇。

主席知道武汉有个“鲶鱼套”

上午8时42分，武昌造船厂3号码头开来了几辆小轿车。车队停下之后，毛主席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来。虽然间距较远，但仍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神采奕奕的面庞。全队官兵几十双眼睛看着毛主席，幸福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也在其中，心情十分激动。那天，毛主席穿着简朴，我一点也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

毛主席上船后，在紧挨驾驶舱的休息室坐下。上午9时，武昌桥头打出了3颗红色信号弹，武汉市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大军下水了。我也驾驶着W506艇通过壮丽的长江大桥水域，往下游方向驶去。快艇

到武汉关后掉头往上开时，毛主席从休息室走出来，站在驾驶台前面，高兴地观看游泳大军同江水搏击的场面。

那时我在驾驶室开船，看不到毛主席，被遮住了，正好当时在照相，然后我就歪了下头，被记录下来。在武警武汉支队船艇大队荣誉室有一张老照片，是毛主席站在船头眺望，他身后驾驶舱内有一个小伙子露出了半个头，那位小伙子就是我。

那时候，船艇大队的组建时间比较短。我隐隐约约听到，在甲板上毛主席问一位战士：“你学会游泳没有？”战士回答：“学会了。”主席又问战士：“你知道这个码头的名字叫什么吗？”战士回答：“我不知道。”而后，主席亲切地向战士讲解：“这个位置叫‘鲶鱼套’，也就是现在的武船位置。”我默默地想，毛主席居然连这个都知道，说明对武汉非常熟悉。

当我们的快艇慢慢地与游泳健儿接近时，毛主席站在快艇甲板上向他们招手致意。游泳方队中，不知是谁起的头，突然间喊出“毛主席万岁”，很快欢呼声与呐喊声响彻大江两岸，现场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场面非常壮观。我的心也随着欢呼声一阵阵激动。

毛主席着白色浴袍，站在快艇甲板上，检阅武汉横渡长江游泳队伍时，挥手向群众致意的瞬间，被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抢拍了下来，成了后来家喻户晓的主席畅游长江的珍贵历史照片，一度被翻印成彩色画报广为发行。

上午10时30分，游泳大军安全顺利地到达终点——滨江公园。这时，我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把船开到江中去，主席要畅游长江。于是我按照上级的命令，立即驾船往上游开去。当快艇航行到汉江口与武昌大堤口相对的江中时，已经做好游泳准备的毛主

席从快艇的休息室向左舷后甲板走去。毛主席走到扶梯前，脸朝快艇背朝江面，一步步往扶梯下走去，他先在水里湿了一下，而后站起来，当水淹到胸前时，伸开双臂扎入波涛汹涌的长江。

主席的游泳技术真的很好，身体素质也很强，已经73岁高龄，还能在湍湍急流中游泳，时而蛙泳，时而侧游，时而仰游……身姿矫健，在江中镇定自若。当时我们这些年轻战士都很惊叹。当天，毛主席在长江里畅游了1小时5分钟，游程30华里。我看到主席上船后脸上毫无倦意，精神很好。

当天还有一个细节。毛主席站在艇外，穿着浴袍，出了很多汗。我看毛主席没凳子坐，就给领导报告：“我去拿个凳子给主席坐啊。”得到允许后，我就赶忙搬了一个小圆凳请主席坐。本来是要搬个椅子的，但是船比较狭窄，我只找来了一个圆木凳。当时船上有8个凳子，为了区分主席坐过的凳子，在毛主席离开以后，我拿红色油漆，在凳子背后专门点了个红点作为标记。

从上船到下船，船开了约4个钟头。回到船艇大队后，按照惯例，我们每个船员都要写航行日志，记录这一天的经历与感受，我也写了很多。54年了，正是因为有深刻的体验与日记的记录，很多细节仍然历历在目。后来我写的那本航行日志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W506艇”改名为“66-716艇”

为了纪念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最后一次畅游长江，“W506艇”后来改名为“66-716艇”。7月16日也被确定为毛泽东畅游长江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武汉都会举行盛大的渡江节。

根据船艇技术的要求，66-716艇的服役时间应为24年，但由于它身份特殊，以至于超期服役近26年。2013年，经武警总部批准，66-716艇光荣退出现役。武警武汉支队船艇大队官兵专门在艇上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向这艘英雄的水上交通艇告别。

2017年，武警武汉支队船艇大队将66-716艇移交给武汉江滩管理办公室。从此，66-716艇作为长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永久陈列于长江之畔。

后来，长江博物馆复原66-716艇内部摆设时，专门征求了我的意见。66-716艇曾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装修过一次。陈列在汉口江滩长江博物馆的66-716艇在复原的时候确定了“修旧如旧、原貌第一”的方针。现在我们在66-716艇内看到里面摆放的8个木凳，都是为了恢复当时船艇内部的原貌。

一看到66-716艇，我就会想起当年为主席开船的场景，所有细节都历历在目。因为，1966年7月16日，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一天。

（胡建平：武警湖北总队武汉支队船艇大队原大队长；王荣海：《楚天都市报》记者）

用镜头记录抗疫天使

◇ 徐震山

2020年3月开始，我带着心爱的相机，免费拍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武汉的援汉、本地医务人员、志愿者，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宝贵经历。

一个月里，我的市内车程近4000公里，每天工作20小时左右，为12支医疗队送鲜花，捐送奖杯870座、锦旗32幅，义务拍摄百人次肖像、逾千人合影，共计拍摄抗疫主题图片1万多张。拍摄时，我建议所有援汉抗疫英雄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条件下，都摘下口罩，做出加油、点赞、鼓劲、比心等给我们武汉人信心的动作和姿态。其中，我拍摄的安徽援汉女护士王琪肖像被《合肥日报》刊登在最显著版面并在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宣传，我为黄璐琦、王辰、乔杰、张伯礼等4位院士拍摄的肖像收获各级领导和本人的点赞无数。

积极投身致敬英雄、记录时代的战疫创作，是我当时最无悔的选择。记得在

2020年元月23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封城。当天我80岁的母亲一人在家突然病重，得知消息后，我立马赶到她家，并告诉全家人，由于疫情特殊情况，我一人来照顾母亲。随着母亲病情好转，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当看到举国上下四面八方的医务人员鼎力支援武汉，我作为一名普通志愿者在家不淡定了……

3月初，我申请了车辆通行证，开始自驾出行，当时我主要是向各社区和单位的抗疫一线人员送去慰问，捐送物资、鲜花及制作奖杯。

3月15日开始，受青山区下沉干部委托，我义务拍摄援汉医疗队合影。离汉的第一批外地援汉的医务人员合影是我组织安排拍摄并连夜设计制作打印出来的。虽然身体透支，但当我赶至机场送照片，看到我们武汉人欢送抗疫天使的热情场景，也不由得两眼湿润。



疫情期间，徐震山拍摄的院士肖像

3月17日，郑州援汉医疗队于下午4:30统一从酒店出发到武汉站返回郑州，而我拍合影定的是下午4点，拍完后还有些仪式。其间，我就想为他们拍点肖像来表达我的感激，但时间仓促，在下午4点前的几分钟，在郑州援汉医疗队队长房间，我花了不到3分钟时间为他录了个采访视频留了个档。肖像拍摄成了遗憾……

3月23日，我到同福社区和扬子社区为当时的志愿者每人拍摄一幅肖像及大合影。扬子社区紧临武汉市中心医院，拍摄时，出于对景深背景控制效果及安全距离的考虑，我让志愿者在社区门牌前方定位，

而我则退至武汉市中心医院出入口拍摄。当时，病人和医务人员不停地与我擦身而过，很多志愿者为我担心，我却微笑道：“今天太阳这么好，病毒进不了我的身。”实际上，看到仅3米多宽的过道，我只有退至中心医院出入口斜对社区门口，距离志愿者6米以上，才能保证照片效果和质量，为了这些志愿者，我也是拼了……

3月27日，有朋友联系我能否为安徽援汉医疗人员拍摄肖像，因为他们即将返回，当地政府要在地铁广告等媒介做宣传，并愿意支付酬金。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当即表示不收分文，并对援汉医疗人员表示慰问和感激。由于时间紧迫，第二天我就上

门拍摄。28日一早就开始处理先前预约安排的事，在午饭未来得及吃的情况下，下午3点我就把先前计划一天完成的事做完了。在3:30出发的路上，连续几天的阴冷天气忽然放晴，午后阳光无比清澈温暖，让我有了拍摄外景肖像的冲动……在后湖他们所住酒店的一楼大堂，我为安徽援汉医疗队董芹芹等3人拍摄了几组肖像。在室外及酒店大堂的乒乓球桌前，我布灯打光，同时还鼓励其中一位小护士摘下眼镜拍了几组照片。后来才知道这位小护士叫王琪，援汉前微博约马云吃火锅，马云当即回复在其抗疫结束返家乡时，一定赴火锅之约。

4月5日下午，有领导联系我下午6点去明珠豪生酒店慰问乔杰院士，因第二天院士就离汉，问我能否拍摄几张肖像送给院士做个纪念。我当即愉快回应并急忙赶至酒店。当第一眼见到乔院士时，她刚组织开完会，看得出院士好生疲惫，头发较零乱，戴着口罩说话声音也有些沙哑。在为其拍摄时，我不希望增加她一丝多余的动作及负担，我一人一灯一反光板。在最后，我建议院士取下口罩为我们武汉加油时，她欣然应允，取下口罩后的院士精神为之一振，露出久违的笑容。拍摄很顺利，这太让我意外和感动。当晚回家后，我立马联系了一家图片社，在多次沟通后，图片社为我安排绿色通道制作输出，第二天早上6点我赶去自己公司挑选了两个相框，7点多去图片社制作配框，终于在上午10点赶到机场，将制作好的相框交给乔杰院士。乔院士拿到相框非常开心，说这么多年没拍过这么好的照片，也很感恩武汉的效率。随行的省市领导都纷纷和院士拿着相框合影，场面感人。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又先后在高铁站为黄璐琦院士、在机场为王辰院士、在酒店为张伯礼院士拍摄肖像，所有照片拍摄到最后我都会建议他们摘下口罩，并传达出对我们大家的信心和鼓励……

随着外地援汉医务人员的陆续离汉，我又将镜头对准了本地医务人员，先后去了同济医院、中南医院、协和医院、人民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等医疗机构，为医务人员免费拍摄肖像。

我从事摄影20多年来，这次感悟很深。首先是拍摄的实践意义。大部分当代摄影家在分享摄影作品技术的同时，几乎都在寻求着一种目的——一种具有自己思想的表达性。但纪实摄影的局限性，使它与我们所看

到的真实场景映射到摄影作品中的实际情况通常并不相符。由于佳作偶成、机遇难得，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偶然的不确定性让我们遗失了很多纪实摄影的机会，而重现场景又违背了纪实摄影的基本规则。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必然的分歧。我们到底是追求绝对的物质真实，还是绝对的精神真实？

其次是摄影在当下世界的意义。由于现代生活水平全面提升，而人们内心的发展又与现阶段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怎样用现代意识和观念正确地认识与理解“艺术立于独诣，废于同能”这个涉及摄影风格创新的问题，影响着中国当代摄影艺术的审美。纪实摄影客观、真实地体现摄影者的态度，艺术摄影则以现实为基础，根据摄影者个人的意愿，通过发散、升华，创造出比现实生活更高的审美情趣、更浓郁的审美感受。风格是摄影之魂，也是摄影者的摄影技术趋于成熟的表现。许多摄影者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向更广泛的题材、更深刻的理念拓展，为体现当下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个性而不断探索。很多摄影作品以丰富的内涵、独立的品格填补了时下审美精神的空缺。这次武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出现了不少关注时下精神以及在技巧展现上炉火纯青的摄影杰作，既显示了摄影者独特的追求，也完善了艺术品格，又彰显了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格局，这都是中国摄影人在当下国际摄影界的重要体现。而我只是这万千摄影人中的一员，“唯有前行，不辱使命”。

（徐震山：湖北文创壹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湖北省人像摄影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弦歌一堂坐春风

◇ 王立

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70岁的耿老太太陈三姑和她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外孙陆续回到武汉，历经8年战争岁月，一家人江城重聚，实为幸事，于是拍下了一张留存后世的耿家三代合影。

1938年秋，耿老太太与儿子、女儿以及孙子外孙随同湖北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辗转来到建始三里坝，这一来就是8年。他们一家与湖北联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耿老太太的儿子、女婿执教湖北联中，孙子孙女求学湖北联中，女儿在三里坝小学教书，三个小外孙在三里坝度过了童年。

看着照片中的这家人，我眼前浮现出三里坝周家堡湖北联中分校旧址围墙中镶嵌的那块“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建”的石碑，上款记“民国二十八年春”，下款署“主任郑万选题”。这位郑万选主任，便是耿老太太的女婿，

时为湖北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主任。

看着照片中的这家人，我耳边响起曾经回荡在鄂西鄂北崇山峻岭中的《湖北联中校歌》：

莽莽江汉，自古称雄，亡秦三户建伟功。
日月骤暝，烟雾朦胧，抗战建国诞联中。
巍巍簧宫，岭叠山重，莘莘学子弦歌一堂坐春风。

扫荡瑕秽，恢复光荣，奠定邦国复兴民族跻大同。

这首校歌激励着万千联中学子在国难当头的艰难岁月中，背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刻苦学习、奋发求知。校歌的词作者，便是耿老太太的儿子耿长寅，时为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国文教员。

这首《湖北联中校歌》原本是《湖北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校歌》，曲作者是该校音乐教员马丝白先生。1939年春，联

中校本部征集校歌，这首《湖北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校歌》从联中各分校校歌中脱颖而出，被选定作为《湖北联中校歌》。

(一)

联中校歌词作者耿长寅先生 1894 年出生于江苏镇江，回族人。耿长寅早年丧父，母亲陈三姑带着他和妹妹耿光住在依傍镇江城墙搭建的三间房屋中，母子三人在城墙下的小院中过着清贫且宁静的生活。在姑母等亲友的资助下，耿长寅顺利读完高中，毕业后在当地的小学、中学教书，并出任镇江回民穆源学校董事。

耿长寅的妹妹耿光读完初中便随其姑母来到武昌求学，就读于湖北省立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黄鹤楼小学当教员，与当中学教员的郑万选喜结连理。

郑万选 1897 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1919 年就读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

地学部，1923 年毕业留校，任地学系助教兼附属中学事务主任。1928 年 4 月，郑万选赴宜昌，任湖北省立第四中学校长。在任期间，因保护进步学生，同年 11 月被省教育厅免职，旋即回汉，任武昌晨星公学校长。

1929 年 4 月起，郑万选先后在武昌乡村师范学校、武昌师范学校、湖北一中、湖北九中、湖北女子职业学校等校任教。1937 年 8 月，郑万选任湖北省立武昌中学校长，抗战期间任湖北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主任暨日后的省立第六高中校长。

因着妹妹耿光，耿长寅结识了武昌女子师范学校的安徽怀远籍女士沈立华。沈家为当地望族，沈父看中了颇具文采、相貌持重的一介书生耿长寅，将爱女许配给他。婚后耿长寅、沈立华夫妇添了两女一丁，即长女耿竟成、次女耿希成、长子耿德成。不幸的是，1928 年耿妻沈立华难产离世，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后经镇江跑马山孤儿院院长、加拿大传教士包斐尔先生介绍，耿长寅与孤儿院长大的刘月珍结为夫妻。

安顿好家小后，耿长寅便去报考南京监狱学校，毕业后在江苏省睢宁县任管狱员兼监所所长。后调往湖北沔阳、汉川等县任职。

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开始，战火在长江下游迅速蔓延。耿长寅 17 岁的长女耿竟成带着 15 岁的妹妹耿希成和 12 岁的弟弟耿德成由镇江乘船西行来到武汉，投靠在汉川任职的父亲和在武汉教书



1945 年秋，耿老太太陈三姑及儿孙回汉后合影，前排左起：耿长寅、耿信成、陈三姑、郑卉林、郑万选，后排左起：耿德成、耿光、刘月珍、耿竟成、耿希成

的姑妈，得以继续求学。抗战期间，耿长寅受聘于湖北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随妹妹耿光、妹夫郑万选一家来到鄂西。

（二）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8月，湖北省政府组建“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郑万选任校长的省立武昌中学高初中部与省立武昌高中、省立武昌高商初中部等四所中学合组为湖北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郑万选受命担任该分校主任。

于是，临危受命的郑万选即刻组织分校人员及物资前往沙市集中，再赴鄂北建校。情况紧急、事务繁多，郑万选无法顾及家小，其当小学教员的妻子耿光怀抱刚满月的女儿郑卉林，带着3岁的儿子郑希特和5岁的儿子郑泽霖，以及60多岁的母亲陈三姑与联中家眷同行。两家上中学的子女则随各自学校行动。

耿长寅长女耿竟成就读的省立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是为湖北联中建始女子师范分校，她便随校前往建始。次女耿希成就读的私立汉口普仁高级护士学校是教会学校，因而随校留在武汉。刚进初中的耿德成则跟着读高一的大表哥郑式谷（郑万选长子）随联中武当山高中分校的学生队伍一同奔赴沙市集合，按原定计划取道襄沙公路北上襄阳前往均县武当山建校。

在沙市，耿德成、郑式谷两弟兄前往源泉公园（后为中山公园）旁边的晴川中学集合。晴川中学是由庙宇改建的，此时作为湖北省教育厅沿途设置的照料所，负责接待联中学生，管吃管住。在晴川中学集结的几天里，耿德成、郑式谷两弟兄晚上睡在神龛上，白天在照料所吃饭，等待编队前往均县。

到晴川中学集合的学生越来越多，大家无事可做，13岁的耿德成常常跟着大同学一起哼着“没有钱也来吃碗饭，也来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她怪模样，朗哩格朗哩格哩格朗……”打发时间。

因战事变化，前往鄂北交通受阻，湖北省政府紧急决定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改迁鄂西另觅校址，并派来小火轮将他们接到宜昌。此时的宜昌，地上满是待运的人员、物资，天上则是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危难之时，省教育厅决定将该校迅速撤离宜昌。10月中旬的一个黄昏，该校高中部和初中部共24个班的1300多名学生、近200名教职员集合于宜昌镇川门，在夜色朦胧中分乘木船渡过湍急的长江，沿古老的施宜官道徒步西行。

由于校址尚未勘定，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只能走一程歇一程。大队人马在木桥溪暂作停留后，启程经贺家坪、榔坪、四渡河来到巴东野三关。

野三关是施宜古道上历史悠久的重镇，地势险峻，加之原定“湖北联中均县初级工业职业分校”已改迁至此，小镇实在无法容纳这么多师生，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只得另觅校址。

此时恰逢湖北省参议长石瑛先生旅居建始，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主任郑万选立即前往请示石瑛先生，幸得石瑛先生指点，在建始县刘亚东县长的帮助下，选定在建始三里坝建校。郑万选立即派事务主任鲍绍武前去筹建。鲍主任竭尽全力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建起教室、饭厅、伙房，赶制课桌、条凳、黑板。在野三关滞留了一个多月的师生们，终于在1938年年底抵达三里坝开学上课。

初来乍到，学校借用区长吴玉庭家刚刚竣工的一幢木架石墙的三层楼房作为校

政厅。校政厅在三里坝横街街尾，不远处便是一条小河，小河的两边各有一长排刚建好的土墙茅屋，河这边的一排是饭厅、伙房，河对面的一排是教室。师生则借住在镇上和附近村庄的民房中。校政厅旁的小山包上架起一座由武汉带去的铜钟，每天清晨和夜晚，滴滴哒哒的军号声催人起床、就寝，铛铛敲响的则是上课下课的钟声。

紧接着，学校在教室后面山上的周家堡建起干打垒的教室和图书馆，周边砌起一道高大的院墙，彰显着学校的庄严与神圣。校园落成时，郑万选主任在校门一侧的院墙中嵌立了那块“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建”的石碑以兹纪念。

很快，学校图书馆便向师生开放了。这些宝贵的藏书是从武汉通过水运，再经人挑肩扛，历尽艰险运抵的，其中一套“万有文库丛书”可谓弥足珍贵。可叹的是学校没有实验室。原来，郑万选主任费尽周折租到的装运武昌两所学校实验仪器设备的那条柏木船，行至西陵峡时触礁沉没，船上的仪器设备尽沉江底。

学校在三里坝的干河坝上修建了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安装了单杠、双杠、篮球架，学生们经常在此举行足球、篮球比赛。操场的一头搭起一个高台，总理纪念周等全校大会、各种集体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正是三里坝的这座简陋校园才使莘莘学子得以“弦歌一堂坐春风”，以完成“复兴民族跻大同”的时代使命。

1939年秋，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更名为“湖北联中建始中学分校”。1940年夏，联中建始中学分校初中部和高中部分设，联中建始中学分校遂更名为“联中建始高中分校”。初中部迁往宣恩高罗小林园杨家大屋，是为“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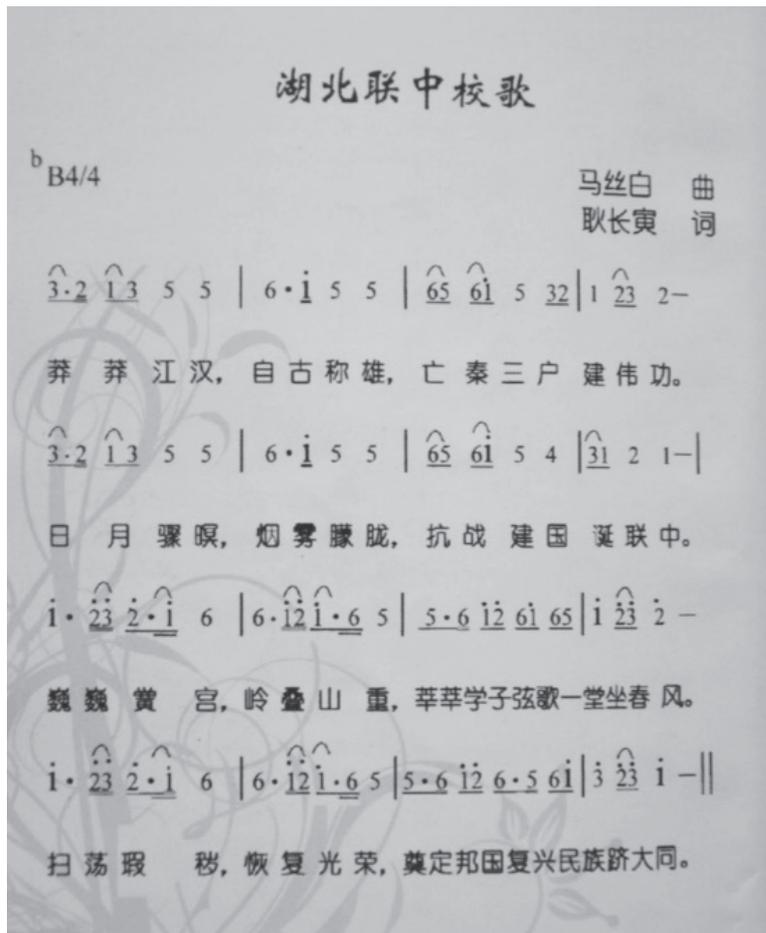
建始初中分校”。刚刚读完初二的耿德成即随初中部师生从三里坝步行至小林园，在联中建始初中分校继续读初三。

（三）

离周家堡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校舍一里多路有座小山，山脚环绕着一条小溪，青山绿水，风光旖旎，几栋茅舍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耿长寅、耿光兄妹两家租住在靠近山脚的两排茅舍中，耿光在镇上的三里坝小学教书。三里坝小学的教职员多为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毕业的学生或教职员眷属，当地人把这所小学看作联中该分校附小。三里坝的学童和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教职员的子女都在这所小学读书，郑万选的两个小儿子郑泽霖、郑希特和小女儿郑卉林便是在三里坝小学启蒙的。

耿家门前有条石板路通往山顶，山上有座庙宇，当地人称“天鹅观”。天鹅观一侧的山坡上，是不幸去世的师生的埋骨之处。夕阳残照西风冷，垒垒青塚向黄昏。每每有师生到天鹅观去，都要到这些老师和同学的坟前默哀凭吊。陈志文同学的墓碑上刻着童伯权先生所撰碑文：“其志尚文，世乃尚武；予欲问天，天则不语。亡之命也夫！”读之，令人伤感不已。

一天夜里，耿长寅突然咳血不止，繁重的教学工作、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积劳成疾，染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抗战期间物资匮乏，缺医少药，患病师生难以得到医治。好在学校组建时，校医务室聘请了老中医周济刚先生和一名司药一同从武汉西迁，然而学校中药房连最基本的具有凉血止血功用的白茅根、藕节都没有。儿子耿德成没课的时候便拿把锄头上山挖



耿长寅作词、马丝白作曲的《湖北联中校歌》

白茅根，煎水给父亲喝。吃了周济刚先生开的多副草药后，耿长寅的咳血竟神奇般地止住了，接下来就只能靠静养了。

耿长寅是基督徒，每天捧着一本《圣经》，躺在儿子耿德成为他准备的特制躺椅上，静静地看书。他笃信精神疗法，坚持以顽强的毅力去战胜疾病。在三里坝的这个静谧的小山村中，耿长寅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喝着纯净的山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受着母亲的精心照料，身体渐渐好起来，一个学期后，又开始到校给学生上课了。

抗战胜利后，耿长寅先后在第十集团军军法处和武昌模范监狱工作。他同情进步青年，设法帮助几个中共地下党员秘密前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经耿长寅帮助

的地下党员辗转找到了耿长寅，武汉市人民政府聘请耿长寅为武汉市文史馆馆员。作为市政协委员，耿长寅曾出席武汉市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列席武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作为武汉市文史馆文字改革研究小组组长，耿长寅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字改革工作中去。1955年10月，耿长寅作为湖北省的7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一人向大会提交了两份提案。在大会发言中，耿长寅说：

武汉解放，我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才知道毛主席在老早就有过“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伟大号召。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定献身于中国文字改革事业。五六年来，

由于自己的学识太差，毫无成就，非常惭愧。我先后做过两种简化字，一种是轮廓字，一种是骨干字，都是没有结合到约定俗成的最高原则的。由于自己不懂草书，我后来把这工作中止，转向到汉字拼音化的方面。又先后做过五套字母，最后做的一套丙种民族综合式汉语字母50个，这一次亲自送交大会秘书处。

1955年10月23日全体会议通过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提案审查报告》将耿长寅的《编印常用字楷简两式手写体对比表案》提交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办理，将《编印常用字各县地方语音和标准语音对比表案》提交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会同研究办理。

这次会议之后，耿长寅继续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如1956年5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专刊《文字改革》第58期上刊发的《可以维持原案改动一下手写体》，1957年第6期《拼音》上发表的《把形意文字的优点吸收到拼音文字中来》。

20世纪60年代，耿长寅多次受到邀请，出席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东湖客舍举行的联欢会、招待会等，同与会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文史馆员一起畅谈，兴之所至，提笔赋诗，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关怀和照顾。

1969年12月，耿长寅先生逝世，享年75岁。

（四）

抗战胜利后，在鄂西生活了8年的耿、郑两家三代回到武汉，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张合影照片。

回汉后，耿光在武昌回民小学教书，当初带去三里坝的3个幼儿也长大了。

郑泽霖在三里坝小学毕业后，到恩施进入湖北省立实验中学，念完初中一年级，暑期回汉后，继续在迁回武昌的省立实验中学求学。1951年7月，17岁的郑泽霖高中毕业，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军入伍，分配到第一军医大学学习，22岁毕业后即留校从事外科医师工作，是著名的外科专家。退休前为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外科学教授、主任医师。

郑希特在三里坝小学发蒙，抗战胜利后随父母返回武昌，就读于武昌四小，暑假毕业后升入武昌实验中学。1952年，郑希特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4年，被派往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留学，1960年年初毕业

回国，此后在高校从事理论物理教学与科研，退休前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年襁褓中的郑卉林也在三里坝小学读完二年级，回武汉后继续上小学、中学。

郑式谷在联中建始高中分校毕业后，考取四川璧山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博物馆学系，毕业后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图书馆学系任助教，后调往上海工作。

耿竞成从联中建始女师分校毕业后，在战时湖北省政府所在地的恩施城当小学教员。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教小学，不久随丈夫去了重庆，仍然从事小学教育，20世纪80年代初退休。

1942年秋，在建始六高读高中的耿德成从报纸上看到湖北省邮局招考的消息，赶紧步行去恩施报考，由此步入邮政系统。抗战胜利后，耿德成随湖北省邮局回到武汉，从此勤勤恳恳在湖北省邮电系统工作了一辈子。

（王立：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退休教授）

近代汉口摊贩群体与都市生活

◇ 任晓飞

或沿街叫卖，或摆摊设点，流动摊贩曾经是汉口街头、茶馆以及各类公共空间中最抢眼的人群，他们的存在为城市朴实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生机。

在埠通货贿的汉口，有数不尽的方式让小贩通过做小生意来维持生计：从出售日常生活必需的各色食品、什物，到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他们能够适应不同的季节或节日提供商品，也能够根据买主的需要采买物品。小贩的资金很少，利润有限，但是他们的生意可以迅速得到回报。在汉口，有很多老年人和不能从事繁重劳动的妇女，甚至许多贫苦家庭的孩子以此为生。

摊贩的群体形象

手提肩挑、走街串巷，或是摆摊设点叫买叫卖，小摊贩具有明显的外部特征，能够使人们在茫茫人海中很容易就辨认出他

们。有人曾这样写道：“譬如我们看着一个老头子，手里提着，肩上挑着，口里喊着，都会把他们列入小贩之流，何故？曰：小生意之谓也！”

活跃于近代汉口大街小巷的小贩，主要来自于周边县城或农村的移民，这些移民与少数外省农民，以及汉口城市中的失业者一同构成了摊贩群体。一项抽样调查研究显示，民国后期汉口街头的摊贩主要来自于黄陂、黄冈、孝感、鄂城、汉川这些武汉周边县市，占总人数的66%，其中又以黄陂与黄冈籍的小贩人数最多。有不少小贩是举家迁到汉口的，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往往从事相同的买卖，在汉口不同街区营业。来自于武汉当地的小贩数量占总人数的26%。其余外省摊贩主要来自江苏、湖南、河南等地。

从年龄结构来看，小贩群体涵盖了各个年龄阶段，最多在21~30岁与31~40岁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报刊的描述

中，还能经常看到以贩卖报纸、小吃或提供擦皮鞋服务为生的儿童。由于雇佣童工或迫使学龄儿童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被认为是社会的丑恶现象，在1946年年末汉口市警察局对小贩营业许可的集中整治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年龄低于15岁的儿童向当局申请颁发营业牌照，但这些以做小生意为生的孩子们不可置疑地普遍存在于汉口的大街小巷、茶馆或戏院中，他们也是近代汉口小贩群体的重要构成之一。

游走都市之中

营业地点的选择对小贩们的生意来说十分重要。有史料显示，近代汉口的公共空间与小贩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无论是最为普遍的街头巷尾、弄堂里份，还是茶馆与戏院，再到具有现代意义的电影院、公园，总是不难找到他们的身影。

街头不仅担负着城市交通，而且还是市民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的载体。对于小贩们而言，人流如织的街头意味着更多的顾客。此外，在街头举办的各种仪式与庆典总是能够给他们带来无数的商机。如每逢正月十五，街头总是聚集着参与花灯庆典的人群。在最热闹的几个街区，小贩们总是捷足登场，站在最显眼的地段，向人们兜售自己的商品。

里份与弄堂中也暗藏着不少商机。小贩们穿行其中，叫卖各种日常生活品或是新鲜的蔬菜，不愿意出门购物的

家庭主妇十分欢迎这种“送货上门”的服务，不但节约了出行的时间，更因为免去了批发商到市场零售商之间的差价，市民从小贩处购买的商品比一般市场上的便宜许多。市民们日常的娱乐休闲活动也能给小贩提供不容错过的生意契机。如在里巷中雀战正酣的人们，总是比较乐于接受小贩们提供的香烟、水果或是点心，这往往由赢了钱的牌友付账。在夏夜，乘凉的人群中总是能看到提着篮子的小贩，在床椅排列的缝隙中穿来穿去地叫卖宵夜或是水果。

茶馆也是小贩们最基本的市场。在茶馆中，最多的是卖香烟和卷烟叶的小贩，其次是卖糖果的，其他如卖刷子、扇子、草鞋、草帽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小贩也为数不少。由于这些小贩适应了顾客的需要，对茶馆的生意有诸多裨益。茶馆老板一般不会拒绝小贩到茶馆卖东西，因为他们给顾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对茶馆的生意有促进作用。另外，有许多小贩将临街的茶馆作为自己小憩片刻的场所，他们本身也是茶馆的潜在顾客之一。茶馆还和一些以给人们提供服务来获取报酬的小贩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提供热



1927年武昌江边城墙下的集市，无数的小贩在这里谋生

毛巾、擦鞋、修理、理发、算命等。茶馆和小贩可以说是合伙人的关系，符合互利的原则，既给茶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也促进了彼此的生意。

不少戏院也与小贩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小贩可以穿行于观众席兜售他们的商品或是服务。根据汉口市剧场糖果业工会发起人余侠山的初步统计，1948年在汉口各戏院、电影院中专门从事小吃、香烟买卖的小贩有两百余人。由于过多的小贩会影响到观众赏阅的乐趣，戏院老板一般会对戏院内流动的小贩进行数量的限制，或是与熟悉的小贩达成协议，对在院内叫卖的小贩收取不多的费用。那些未能获得进入戏院买卖资格的小贩，则将戏院门口的街头作为营业的场所，因为在热闹的戏院周围总会聚集大量的人群，他们是小贩的潜在顾客。

公园中也有许多小贩出没。以著名的汉口中山公园为例，该园人流量较大，且游人一般有消费的心理准备，因而成了小贩们兜售食品、招揽生意的绝佳场所。为了保护园内交租经营的园商们的利益，地方政府曾一度“严厉禁止外来照相馆入园拍照及小贩入园”。禁令使小贩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公园入口摆满水果或小吃的摊子，期望公园门口如织的人流能挽回一些生意。

生意之道

小贩经营的货品种类五花八门，十分丰富。出于对成本、资金周转以及主要顾客群体需求的考虑，一般以各种小吃和日常生活用品为主。“除了日用必需品之外，最普遍的就是青菜、糖、饼、油条、香烟、点心等，这也不外是成本既轻，又易脱售之故。”在茶馆和戏院这样的场所中，还有不少小贩

通过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换取微薄的报酬。比如，一些工匠就直接将茶馆作为工作的场所，他们修理各种鞋帽、扇子、雨伞等；一些小贩为茶客擦鞋、修脚、掏耳朵、理发、祛痣。算命先生通过向人们兜售“神机妙算”的本领过活，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也属于概念较宽泛的小贩群体中的一员。

“芝麻馓子叫凄凉，巷口鸣锣卖小糖，水饺汤圆猪血担，夜深还有满街梆。”小贩们的叫卖声是近代汉口街头独特的“城市音乐”。极具地方色彩的吆喝声，可能在外地人听来花样众多而且难以理解，但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却是通俗易懂的。一般来说，小贩招揽生意的方式有两种：吆喝与响器，这是他们走街串巷必不可少的本领。小贩为招揽生意而发出的各种声音是人们近代都市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难想象：每当黎明时分，城市被从茶馆、街边小店、手推车传出的各种杂音和小贩们的吆喝唤醒；日出之后，各种各样的小商贩登上了他们的舞台，在都市生活的交响乐中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表演。

在汉口，每种小买卖都有其独特的叫卖方式，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判断某种小贩的到来。如卖油条的小贩多为贫穷的老人，由于白天喊了一天，嗓音已经沙哑，加之饥肠辘辘，在夜间叫卖时，他们的吆喝声嘶哑苍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年轻的小贩，他们吆喝起来声调高而清脆：“香烟呀！荸荠呀！削了皮的。一百卖六十！”“喝的！三个铜板一喝！喝了，解凉又止渴！”人们对小贩的吆喝声如此熟悉，以至于有时小贩还没来得及喊出商品的名字，人们立即就能意识到那是卖什么的。人们还能从耳熟能详的叫卖声中准确地分辨出哪个小贩价格公道，哪个小贩爱耍滑头

或者刻薄，并根据这种判断选择与又好又公道的小贩进行交易。

聪明的小贩还能将叫卖的内容编成顺口溜，吆喝起来腔调十足，有滋有味，合辙押韵，抑扬顿挫，不但能将商品的特点、优点都唱出来，而且还能取悦顾客，达到增加销量的目的：

“雪花膏、美人胶、香水、香粉、香肥皂；冰片粉、爽身粉，蚊子一见就会滚，宝宝一宵睡安稳！”

小贩除了吆喝叫卖，还用各种打击声吸引顾客。和独具特色的吆喝声一样，居民能通过区分不同的敲击声来判断小贩的身份、所卖何物。最常用的是拨浪鼓，由一根两尺余长的木棍穿上一个两边缀着小木球的皮鼓组成。由于售卖针线、花布、胭脂、扑粉等女性用品的乡下货郎常常手执拨浪鼓，顾客群主要为女性，这种响器最初还被雅称为“惊闺”“唤娇娘”。民国之后，小贩们招徕顾客的方法变得五花八门：擦皮鞋的敲踏脚箱，卖冰棍、冷饮的敲柜子，卖梨膏糖的拉手风琴，卖麦芽糖的敲铁块，卖雪花膏的打洋鼓、吹洋号，连不少算命先生也拉起了胡琴，以广招徕。

在夹缝中谋生

小贩是近代汉口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之一。衣衫褴褛、粗茶淡饭、家徒四壁，他们徘徊在生活的最底线。雪上加霜的是，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还不得不忍受种种歧视与责难，任何人与小贩之间的摩擦都有可能演化成对他们的暴力：以卖粉面为生的小贩胡良珍在一次大雨中因躲雨与几个码头工人发生了争执，竟被朋殴致死。警察有时会奉命驱赶街头的无证摊贩，他们执法粗暴，常

常将箩筐踢得满街飞，而小贩们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生活和精神上的压力本已使小贩们不堪重负，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恶性通货膨胀中，他们的生活愈发举步维艰，难以忍受生活的高压而自杀或罹患精神疾病的现象在小贩群体中屡见不鲜。

在其他入眼中，小贩从事着最卑微的行业，只能维持温饱。但在小贩自身，为了能在夹缝中谋求生机，他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拼尽全力。很多史料向我们证明，近代汉口的小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确保他们的生意顺利。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他们都游走于大街小巷、茶馆或戏院中，竭尽全力、不分昼夜地谋生。

严酷的生存条件和激烈的竞争将小贩磨砺成一个个精明的生意人：他们善于把握各种时机，知道什么地方能找到合适的顾客，知道怎样以最低的价格进货，知道有多少利润就能卖掉手中的商品，也知道怎样使他们的商品更有卖相。把握正确的时机对成功的小贩来说十分重要，在适当的时间售卖适当的货品可以令他们事半功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岁末年初是小贩经营的高潮，成功地把握这个时机能赚到相当于平日几个月的利润。

为了提高销量，改变传统的吆喝方式是最简单且效果最佳的办法。只要抓住顾客的购买心理，大肆宣传就可以达到不错的广告效应。不少小贩深谙此道，即便是微小物价下调，也会成为小贩们宣传的重点，于是在汉口的街头，人们常常可以听到小贩大喊：“跌了！跌了！手巾一角钱两条！跌了！跌了！凉粉一个大角子一喝！”到处都是“跌了”的声音。有的小贩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不惜哗众取宠，以怪叫声或虚假信息招徕顾客。“报贩为求推广其报纸销

路，往往捏造消息，故作危言，怪声叫卖，以耸动听闻。”报贩们的这种行为被政府认为是“妨碍善良风俗、扰乱公共安宁”，曾被屡次责令取缔，但收效甚微。每每风头一过，怪声叫卖便会死灰复燃。

一些小贩喜欢卖弄他们的技术，不仅招徕顾客，也提供了娱乐。例如，在茶馆、戏院中为人们提供热毛巾服务的小贩几乎都具有一项特殊的技艺：在十分拥挤的茶馆或是戏院里，他们能够将热毛巾准确地扔给任何一位顾客，并从空中接住顾客扔回来的毛巾，甚至能够同时接住几张从不同方向扔过来的毛巾。他们有时还会炫耀技术，故意让毛巾在房梁间穿来穿去，或是用嘴去接。顾客看得高兴，甚至会满堂喝彩，也会给小费。

有些小贩们为招徕顾客而提供的娱乐或表演并不会带给人愉悦，他们不惜伤害身体，以各种残酷的表演吸引人们的眼球，这样做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卖出他们的商品：“有人将洋钉和着碎玻璃大把往口里倾倒，只为引起那些有残酷欣赏欲的观众，买他的廉价药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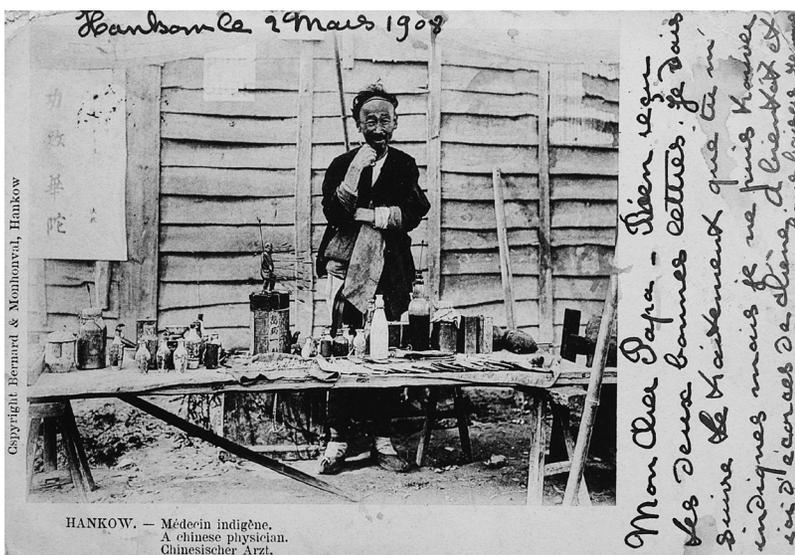
大多数小贩都努力挣着辛苦钱，但也有一些人投机取巧。有的小贩雇人假装买货以诱骗顾客，另一些则以赌博或抽奖的游戏来引诱路人，不少儿童成为这些不良摊贩的常客。兜售色情书籍或画册也是无良摊贩谋取不义之财的常用手段之一。在晚上，他们常常在街角等候潜在的顾客，伺机向他们悄悄兜售身上藏匿着的色情书刊或画片。有的小贩甚至将

此类书刊明目张胆地摆放在书摊上销售。违禁书刊的买卖十分普遍且屡禁不止，给不少旅行到汉口的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严格管控下的城市摊贩经济

小贩对汉口的都市生活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极大方便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烦恼。由于小贩人数众多，而且喜欢集中在闹市区，摊点位置突出于街面，侵占了马路和人行道的空间，使本来就已经十分拥挤的城市交通变得水泄不通。一些小贩还常常将摊点摆放在商铺门前，影响了商铺的生意，引起了店主的不满。而在戏院与电影院中肆意穿行的小贩还阻碍了观众的视线，并破坏了场内的秩序，种种行为使剧场生意蒙受了损失，不少经营者曾多次请求地方政府予以管制。

小贩们所售食物的卫生状况也引起了不少社会精英的担忧，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有人曾撰文对小贩们售卖的糖水及其他饮料的卫生表示



晚清汉口街头卖药为生的摊贩，简陋的摊点摆满了各式药品

怀疑：“关照摊贩的主顾，完全是一般无知无识的儿童，试问那些‘糖水’，在这个传播疫病的春天，经过几日几夜，是不是要‘臭’‘坏’？以之饮入儿童腹内，一旦中了毒，无疑地要发生病症，诊得不好甚且要断送小命！”

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市容市貌以及商铺、剧场经营者的利益，迫于各种压力，汉口市地方政府曾多次对小贩进行控制。从一份《汉口市摊贩管理规则》的档案中可得知，政府对小贩群体的控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小贩数量的控制。这主要依赖对小贩们的登记管理，《规则》要求汉口所有小贩必须于开业前填交登记表，并由管区警察分局酌情准予发给营业执照，未获得营业许可的人不得沿街叫卖或摆摊设点。二是对小贩经营地点的控制。规定了“凡领得营业登记证之摊贩应集中在指定场所或区域营业，不得任意摆设他处”，通过这样的办法可以将小贩的营业限定在某一范围内，便于管理。此外，限定某一区域内的许可证发放数量也可避免热闹的街区因摊贩林立而导致交通拥堵的现象。第三是对卫生的控制，包括对营业场所以及所售食品卫生的管理。《规则》规定所有摊贩有维护营业场所卫生的责任，不得将果壳与杂物随意丢弃。此外，还要求他们自筹资金，在营业地点设置公用垃圾箱。对于饮食摊所售食物以及餐具，除要求保证卫生之外，还禁止出售染色食品等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

地方政府对摊贩经济的控制出于对地方公共秩序的维护，却忽视了对小贩群体利益的考量。如对小贩数量的严格控制必然导致大量小贩的失业，使得经济萧条中本来就凋敝的民生变得越发捉襟见肘，大量失业者也会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对小

贩营业地点的限定令小商品经济的灵活性丧失殆尽，也使小贩们失去了把握各种商机的可能。此外，对卫生的严格控制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贩经营的成本，迫使他们改变经营生意的传统方式，使他们本来就微薄的收入更显紧张。

不过小贩们具有顽强的韧性，很多史料证明，地方政府对小贩的严格控制虽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与谋生方式，但从未让这个群体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过。面对日益强化的管控，小贩们总是能找到自己的方法，继续着他们的营生。

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小贩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以小贩为主体的职业工会。例如1946年，由刘吉安、陈春山、张汉庭等7位小贩发起组织的汉口市剧场小贩业职业工会，主要由各剧场内负责贩卖香烟、水果、糖食、卤菜及应时食品的小贩组成，成员有数百人之多。工会发起人声称，“民等负贩在各剧场工作，辄受宪警干涉，生活堪虞。处此党国之下，无工会则无团结，无团结则无生存。”并强调“人民团体”在维护自身利益时起到的重要作用。

可以看到，无数的小摊贩将近代汉口的公共空间与市民的日常生活连接起来，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商业空间与文化空间，对形成汉口城市活跃的公共生活与大众文化产生了积极作用。他们为了市民的日常需求而工作，为都市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如果没有他们，不但人们的日常生活将遭遇诸多不便，而且这个城市将失掉很多生机，显得沉闷而失去蓬勃的气象。

（任晓飞：武汉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汉剧三生大王二三事

◇ 周希正

2020年4月，我应南方科技大学中国传统文化节组委会的邀请，在文化节闭幕式上，把汉剧讲座进行云上直播。从收到邀请到播出，短短10天的准备过程，得到了汉剧界各位艺术家们的鼎力相助。从文本上解读、艺术上品鉴、流派上归纳，为我清晰地展现了汉剧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特征。我的讲座题目《汉剧——武汉城市的名片》，也正是基于这种艺术与文化的脉络，而对于艺术与文化的创造者——汉剧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探究，却成了我讲座后续的意外收获。

作为著名的汉剧三生演员，吴天保先生创立了风格独特的“吴派”艺术，平生为发展汉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汉剧大王”。吴派是汉剧重要的表演流派，而流

派艺术是通过剧目得以传承。要探寻吴派的艺术特色，吴派剧目《哭祖庙》是绕不过的话题。因为，现在汉剧三生行当的表演，基本都以吴派为程式标准、行当规范。《哭祖庙》的舞台表演因为规范而习以为常，我需要在这些习以为常的外在表象中，寻找吴天保先生当初艺术创作的内在灵魂。在查找汉剧史料时，关于吴天保先生艺术特征的理论研究并不多，作为汉剧重要的流派这是一种遗憾。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将探寻的方向转移到吴派传承实践的田野调查中。熊留华老师是吴天保先生的弟子，他的《浅谈吴天保表演艺术特征》是为数不多的将吴派的艺术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文章，文章不长，但其中透露出许多有价值的信号。因此，我决定对熊老师进行田野调查，通过熊老师的回

忆，再现吴大师那鲜活的人物形象、那师徒间艺术碰撞的往事，带我们走进通往吴天保大师内心世界的那扇门。

大王柔情

作为汉剧三生演员，熊留华老师说他是幸运的。作为三生行当的学员，在汉剧院舞台实践阶段，熊留华被吴大师安排跟在身边。不仅能够有幸零距离领略吴大师的艺术风采，而且无论汉剧院送戏下乡、全国巡演，熊留华都受到大师更多的关照。大师在繁忙的演出空隙挤出时间，给他亲授《哭祖庙》的往事，那些生活中的真实，艺术上的提携，至今清晰难忘。在跟随大师下乡演出的过程中，大师的艺品、人品深深地影响着他，这种亦师亦父的情谊，是他最宝贵的情感经历。

在武汉汉剧院，吴天保大师是深受大家尊重的艺术家，他将舞台上帝王将相的气场带到生活中。这种强大的气场让许多人对大师敬畏三分，每当剧院排练、开会，只要门口传来大师特有的脚步声，大家都会相互说：“大王来了。”顿时，周围安静了下来。熊留华也是这样，对师傅充满敬畏之心，只要师傅用他特殊的腔调叫道：“熊留华小娃娃。”他一定马上回应：“师傅有什么事情。”因此，吴大师喜欢让熊留华帮助他做些生活上的琐事。生活上的相处，艺术上的教诲，让熊留华觉得，那个不苟言笑的“吴大王”，在强大的气场后面，其实有着一颗充满父爱的柔软之心。

1963年7月，武汉汉剧院开始了行程一百场的送戏下乡之行。英山是湖北的偏远山区，也是汉剧团此次下乡的主要舞台，连续的转场演出，每一次转场都要步行几十

里山路，翻几座高山。当时吴大师是演出团里年龄最大的演员，也跟随大家一起爬山涉水。作为演出团的团长，吴大师不仅要在舞台上演出重要的角色，而且还要负责演出团的衣食住行。熊留华至今还记得每到一个演出地，吴大师都要用他自己的薪水吩咐熊留华到当地买一些鸡、肉、禽蛋为随团的三个女演员加营养餐，而且每次的金额都不少。有时熊留华会不解地问：“国家不是有饮食标准吗？您怎么还用自己的薪水？”吴大师说：“三个女演员演出任务是我们团最重的。一个是每场必演的四旦，一个是负责演出质量排、导、演的导演，另外一个演出不可少的八贴，而且她还在哺乳期。”熊留华知道吴大师是非常节俭的，对同事也是规规矩矩没有多的交流，以至于私下大家都认为吴大师蛮小气，在生活中也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谁也想不到大师威严的外表后面还有这样的人情温暖、古道热肠。正是这样的特殊经历，让少年的熊留华看到了“吴大王”善良大气的柔情本色。

大师的柔情本色不仅体现在生活的细节，而且体现在艺术上对后辈的提携。为了艺术创作，他可以大气地让出自己的中场。演出团在送戏下乡的过程中，有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小折子戏，如老农民、地主等小角色，而演出团人数有限，为了演出效果，吴大师主动承担起这些龙套，并且演得入木三分。每次出场观众都给予热烈的掌声，有一次演出完了，大家正准备卸台，只见一位80岁左右的老乡绅来到吴大师的面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大师的面前，激动地说：“大剧的大演员，我这辈子看到了。在我们山区，上次请到汉剧这样的大剧大演员还是一百年前，当地出了一位状元，请来了汉剧班唱过几天汉剧。”能够看汉剧，在当地是

一种荣耀。因此，他特地要给吴大师行此大礼。吴大师连忙搀扶起老人，真诚地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吴大师面对基层老百姓的鼓励无数次返场，有时嗓子很疲劳了，也没有在艺术上打折扣。看着这样的场面，熊留华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流派艺术的群众基础是艺术家用真情构筑的，吴派能够成为汉剧的重要艺术流派，是吴大师用自己的高超技艺塑造了许多老百姓认可的艺术形象，“大演员”是老百姓对吴大师的最高奖赏。在演出完回驻地的路上，熊留华背着师傅演出用的道具，搀扶着满身疲惫的师傅，看着散场的老百姓打着火把沿着山路行走的那一条条流动的火龙，这种壮观的场面，师徒二人那种欣慰和满足是在城市剧场中得不到的。尽管辛苦，艺术家和观众的这种亲密互动带来的是另外一种快感。

第二天，演出队要翻越两座大山、渡过一条河转场到英山草坪乡演出，熊留华陪着师傅沿着山路走得较慢，慢慢地落在大队伍的后面。大约走了4个多小时，师傅看看天色，对熊留华说：“娃娃，我们加快速度，跟上大队伍，别误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师徒二人鼓起劲，赶上了抱着孩子落在队伍后面的周家耀夫妇。看到他们夫妇抱着孩子走得有点吃力，师傅赶上前接过孩子，充满柔情地抱着汉剧的第三代，为了给大家鼓劲，大师用他激昂的嗓音唱起了抒情的山歌。悠扬的歌声回荡在青山翠谷，伴随着初秋凉爽的山风是那样沁人心脾。熊留华听惯了师傅演唱激越高昂的西皮二黄，见惯了师傅扮演威严的帝王将相，今天听到师傅情不自禁唱的乡野山歌，看到师傅儿女情长的慈父形象，那个艺术造诣到天际的“大王”，其实有着一具有血有肉的凡身肉体。没有架子的



1963年10月，吴天保（左）和熊留华师徒二人合影

“大王”让熊留华多了一份亲近，师傅落地的平凡让熊留华更添一份敬重。

大师传艺

熊留华老师是汉剧团在新中国成立后，于1957年招收的首届学员。可能是嗓音条件比较好，被分配学习汉剧三生，当时吴派艺术在汉剧三生行当被奉为生角的典范。因此顺理成章的，少年时期的熊留华发蒙教学就是宗吴派。吴派的《哭祖庙》是教学重要的范本，指导老师是杨鸣亮、李少芬老师。这两位经验丰富的汉剧前辈对这批汉剧幼苗倾注了全部心血，当时的熊留华只有10岁多，很听老师的话，无论老师布置多少专业课作业，他一定会认真完成。因此，老师们心目中的一号种子，就是少年熊留华。几

年后，在老师们精心的教导下，《哭祖庙》成了少年熊留华的保留剧目，也常常在汉剧舞台上演唱——“进祖庙不由得泪如雨滴”。那一招一式宗吴派的表演程式，也为少年时代的熊留华赢得了掌声。那时的熊留华对吴派声腔的钻研如醉如痴，吴大师的每一次演出，少年熊留华都要想办法去剧场蹭戏。他在心里有一个目标，《哭祖庙》一定要得到大师的真传，希望得到大师在艺术上的指导，成为大师那样有成就的汉剧大腕。

英山之行单独和师傅相处，促成了少年熊留华与吴大师一世如同父子的师徒缘分，也许大师有感于熊留华在演出途中对自己生活上的照顾，或许是看到他眼中的熊留华小娃娃对吴派表演艺术的执着和热爱。在英山的草坪乡那一站演出后，回到山顶的招待所，熊留华在招呼大师梳洗换衣，按惯例为大师泡上一杯香茶，为大师搬出竹子躺椅后，正准备回去睡觉，大师叫道：“小娃娃，你过来。把《哭祖庙》反二黄的导板唱给我听听。”啊！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在英山的那座山顶招待所小院，在万籁俱寂、满天星星的午夜，空旷无人的山野，就这样传来了一老一少和声交集的两种声音：“进祖庙不由得泪如雨滴。半山回音，夜风和鸣。”少年的声音清脆悦耳，老年的嗓音悲壮激越。师徒二人将这段二黄导板唱成了天籁。

那天夜里，熊留华在师傅面前格外用心地唱，他将平时在舞台上为大师站班偷学的、艺校学的、唱片上剽学的吴派声腔特点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尽量完整地表达出来。师傅躺在椅子上、手打着拍子、半眯眼仔细地听熊留华唱完“进祖庙不由得泪如雨滴”二黄导板的那十个字，停留了十几秒的时间，对着熊留华说：“小娃娃，你嗓子很好，唱得不错。但是刚才你唱的是谁？在什么情况

下唱的这段？唱这段的情绪层次是怎样递进的？”师傅没有在演唱上直接点拨，而是让熊留华在演唱中将注意力放在“人物、场景、情绪”上，着实出乎意外。熊留华对从艺校学的《哭祖庙》、在舞台下看到师傅演的《哭祖庙》那一招一式已经烂熟于心，声腔上的转弯抹角和师傅的唱腔模仿得惟妙惟肖，那种形式上像吴派是熊留华的追求重心。当时熊留华答不上来，愣在师傅面前。现在回想起来，师傅可谓一招击中熊留华的软肋。人物的塑造是表演艺术的灵魂，演员表演内心没有人物形象，将永远停留在艺匠的层次。这是师傅后来告诉熊留华，为什么当时会将人物的形象塑造放在那次特殊的单独授课中的原因。师傅说：“当时你在唱那段二黄导板时，眼睛是空的，没有刘谡的悲、怨、恨眼神，所以你唱得苍白。演戏给观众看，看什么？看戏曲演员在唱、念、做、打中塑造的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师傅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解开了熊留华心中纠结了好长时间的那个结，为什么师傅总是在塑造戏曲人物时会恰如其分地用好戏曲的传统程式？原来就是抓住了唱戏一定要唱人物情感这个“魂”。一切服从人物的需要，程式是为刻画人物服务的。人们在总结吴派的艺术特点时都会写道：吴派善于将戏曲传统程式用于刻画人物的性格。

接下来的三天，师徒二人的教学总是在戏散场的午夜，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在午夜？因为白天师傅要排戏，午夜山区没有其他人，也不会影响别人休息，所以才挤时间上演大山顶上的夜半歌声。师傅常年的演出生涯已经形成深夜精气神兴奋的状态，即使是午夜时分，师傅总是在教学时精力充沛。但是每天的连轴转让正是贪睡年龄的熊留华有点吃不消，熊留华有点跟不上师傅的

节奏，瞌睡虫有时不知不觉地爬到熊留华身上，在学习过程中慢慢地就打起瞌睡了。这时熊留华会被师傅的“泥古”敲打在上，马上惊醒。当然这样的状态学习肯定会打折扣。师傅其实也很理解熊留华，但是师傅着急，希望熊留华能够在这次下乡演出中学到真本事。因为回到武汉会有繁忙的团长事务和演出场次，还有其他学生要教。所以，知道熊留华辛苦，也没有放松对其专业上的要求。每当熊留华学习分心，师傅就叫熊留华“蠢牛木马”，熊留华“蠢牛木马”的外号就是师傅在那个情景下给取的。这样的教学让熊留华终身受益，这样的师傅让枯燥的教学充满温暖。熊留华直到现在都感恩师傅在他艺术成长道路上打下的坚实基础，就是凭着这样扎实的基本功，以后在汉剧院做行政工作也没有离开舞台。

流派的形成是在不断融合和创新中发展的，如同地域文化的融合性。熊留华跟随师傅学艺时耳濡目染，为了完善表演艺术，广泛观摩兄弟剧种、姊妹艺术，从中吸取养分。中南戏曲汇演作为中国戏曲绽放的百花园，汉剧吴派艺术以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总是能够傲立于其中。作为汉剧三生泰斗，吴大师艺术造诣已经非常高了，艺术成就也斐然。但他对于全国来的各路艺术家都给予极大的尊重，自己总是准时坐在台下认真观摩学习，同时要求自己的弟子也一定要看其他剧种的演出，并且要汇报各自的艺术见解。大师以身作则，总是首先发言，谦虚地说出自己学到了什么。

师傅在艺术上有位挚友是京剧界的麒派鼻祖周信芳。熊留华有幸跟随师傅接待了从上海到武汉来演出的周信芳先生。周信芳先生的武汉之行一票难求，熊留华沾师傅的光，观看了麒派的全部演出，感受到麒派表

演艺术的魅力，以传统程式刻画人物，“演活了宋江和宋士杰”。师傅在观看后，听到熊留华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娃娃你入门了。”大师在艺术道路上要求不分剧种、不分流派去吸取艺术养分的开放态度，深深地影响着熊留华，熊留华也是这样去追求的，在学习了吴派的艺术精髓后，将其他流派的长处也融入到自己的表演中。

吴派艺术丰富了汉剧剧种的表演内涵，使汉剧剧种的表演形式更加丰满、平衡。“尊重吴陈派，弘扬江汉声”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为武汉汉剧院成立而题的词。吴天保先生能够在三生行当脱颖而出并形成流派，他流派的艺术魅力在哪？我很幸运，在认识汉剧、了解汉剧的过程中，通过他的弟子、传人在介绍剧种的时候，为我讲述“吴大王”轶事的点点滴滴，能够在他社会生活、艺术实践中最真实地再现吴派的流派审美、艺术思想、师承关系、受众群体、艺术特色等，为我们还原一个有情有义、艺高德正的三生大王。

（周希正：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